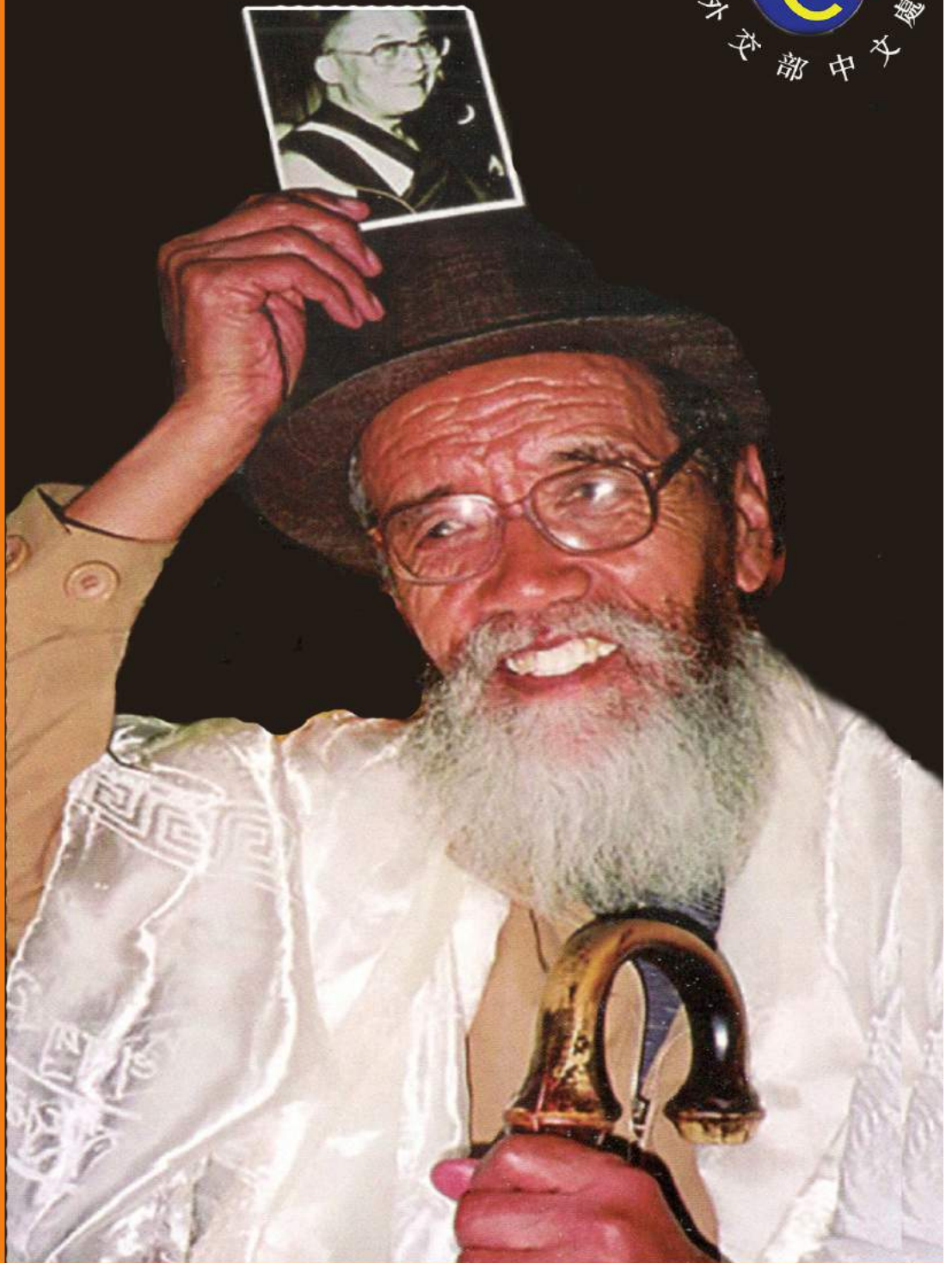


原政治犯达那·晋美桑布人生经历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发行

原政治犯达那·晋美桑布人生经历

(以问答式整理)

西藏九、十、三组织整编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處 譯



达那·晋美桑布简历

原政治犯达那·晋美桑布于公元 1927 年生于拉萨以西的曲水县，其父达那·索南次旺，生母嘎玛曲珍。公元 1952 年，达那·晋美桑布年满 26 岁时担任拉萨市第一小学教师，公元 1964 年被中共当局拘捕判处 3 年有期徒刑。公元 1970 年再次被捕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公元 1988 年第三次被捕后又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1988 年因在狱中呼喊“西藏独立”口号，被加刑 5 年，以及 1991 年，瑞士官方人员参观扎基监狱时，因呼喊口号，再次被加刑 8 年。总之，身陷中共牢狱长达 32 年之久，成为被中共当局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公元 2002 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前往美国，目前居住在瑞士。

(以问答式整理)

西藏九、十、三运动整编

前言

出版这人生经历一书，便是我早期之希冀，但本人还没有小学文化水平，且身陷中共牢狱近半个人生，在中共专制下的所谓“劳改队”毫无自由可言。一个不学庸夫，年老昏聩的人不得不靠他人来完成此愿，于是便请求狱友彭措旺秋(外号“成道者”)，来着手撰写。然而，在修改时发现诸多之处不合我意，便决定另行撰写。因为他在讲述我的人生经历时过多地描述了有关他的故事，俗话说“自己的钟要自己来敲”，我觉得这里没有必要添加别人的观点。此时已耗资 7 万多卢比，但不得不终止。之后，西藏 9103 组织编辑拉恰金巴一边聆听我的叙述，一边撰写了这本关于我的人生经历书。虽然，金巴先生很恰当的描述了我的经历，但因他的藏人水平很高，使用的词汇如大藏经一般过于显示书面语，再加上浓厚的安多方言，这如同《词藻学-海水点滴》曰：

圣地古典《甘露藏》之中

虽则珍宝善说极珍贵

然其难适今世之人意

帝释座前众神如是言

因此，不得不再次邀请西藏南捷寺法师图丹亚培修改成现代年轻人易懂的表达形式。这位大师以慈悲之心应允了我这年老昏聩人的请求，在此表达由衷的感谢！

达那·晋美桑布

于公元 2012 年 1 月 11 日敬上！

中文譯序

达那·晋美桑布，这位在两藏社会境内外堪称传奇式人物恐将成为全世界被关押最久的政治犯之际，几经人权组织的不断努力，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共再三呼吁和极力施压，才得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

在这位无畏奇人非同一般的一生中，曾被中共当局所谓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对他判刑三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五年，十年。在狱中依然同当局无畏不惧地展开斗争，因此，又加刑两次，第一次为五年，地二次为八年。最后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施压下获释。屈指一算，仅仅在狱中关押整整 32 年。可谓一生在监狱中度过，无疑，期间经历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同时，监狱对他的人生造就成“传奇”。也可以这么说，达那·晋美桑布的人生是监狱，监狱是他的人生。

虽然，此书对达那·晋美桑布一生充满传奇的感人故事和苦难遭遇描述的不够全面，但也折射出中共当局在奴役蹂躏藏人的同时，践踏了人权这个比主权更可贵的人类普世价值观。从达那·晋美桑布前后数次被判刑，以及对他判刑的法律依据中，可以看出中共当局诬陷藏人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更值得一提的是，达那·晋美桑布，一生所经历的磨难和惊人的毅力，为下一代西藏人树立了一面鲜艳的旗帜，亦为西藏获得自由，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勇气。当然，更能启迪世人对真理和非暴力的信念。

《身陷囹圄三十二载-达那·晋美桑布人生经历》一书，以问答方式编写成书，作者希望从藏文翻译成印度文，中文等不同文字，中文版译者頡爾宗·德丹因工作繁忙，利用业余时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此项翻译工作。故此，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指正。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處

2016 年 1 月 11 日

目录

- (1) 前言
- (2) 出版说明
- (3) 编者按
- (4) 赞礼

第一部分: 当初如何出狱赴美及其经过

- (1) 当初获释出狱
- (2) 如何抵达美国
- (3) 抵达美国的详细经过
- (4) 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
- (5) 抵达北京后的感受
- (6) 离开北京飞行西方

第二部分: 抵达美国后的情况

- (1) 会见政要人士及介绍西藏问题
- (2) 治疗疾病并同当地民众交流
- (3) 从美国前往瑞士
- (4) 第一次荣幸得到达赖喇嘛尊者接见
- (5) 供奉“凶天”及其释疑
- (6) 居住瑞士开展其他事项

第三部分: 在拉萨第一小学担任教师

- (1) 第一小学及担任教师
- (2) 参加工作队
- (3) 从工作队返回学校及其感受
- (4) 以上工作方面的利弊
- (5) 拉萨临近中共侵占前的议论

(6) 公元 1959 年前后的真实情况

(7) 1959 年战后的拉萨状况

第四部分: 遭捕入狱

(1) 每次入狱判刑情况

(2) 第一次入狱的原因

(3) 第二次入狱的原因

(4) 第三次入狱的原因

(5) 入狱后的感受和得失

(6) 在监狱中受审情况

(7) 在监狱中开展绝食活动

(8) 监狱状况和生活感受

(9) 监狱中遭受什么样的虐待

(10) 在扎基监狱与囚犯开展抗议活动

第五部分: 有关出生地和父母等情况

(1) 出生地和父母亲的种姓血统

(2) 人生中有关对宗教的看法

第六部分: 对有关藏人行政中央的看法

(1) 对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贯看法

(2)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3) 最后对年轻人提出的要求

(4) 鸣谢

(5) 与人生经历相关的一些珍贵相片

原政治犯达那·晋美桑布人生经历

(以问答式整理)

赞礼

因是佛子发心加持力

登基佛教教主之宝座

赞礼佛祖丹增嘉措彼

利生事业遍及瞻部洲

不为谋取个人之名利

只为为何入寇我藏地

吾等晚辈来日为雪域

意欲了解或为所需故

翔实记述吾辈之感受

第一部分:当初如何出狱赴美及其经过

1. 当初获释出狱

洛桑卓玛提问: 扎西德勒!能够同老师再次见面,我感到很高兴。按昨天已安排好的工作方案,从今天开始就要针对有关老师人生经历和感受方面进行问答。老师,现在就要开始了。

达那·晋美桑布答复: 很高兴今天能再次见到你。好!你准备提什么问题?

提问:我住在美国时,虽然听说老师您已经到这里了,可这两天才见到您。很高兴今天能够向老师提问关于您人生经历事宜,本来我们之间是师生关系,俗话说:“人活着必相会”这话没错。今生能再次见到老师感到无比荣幸!我想请教的问题是,老师本来还在被关押当中,现在不但获释,而且突然抵达美国,这让所有人感到惊讶,请谈谈发生此事的经过好吗?

答复:是的,此事发生的很突然,毋庸置疑这让人们感到惊讶,我自己也感到难以相信。我觉得有必要详细介绍这个经过。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世贸大厦被撞击的“9·11事件”,当时在监狱内也在收看这方面的新闻,那期间本人因身体不舒服,没有去观看。狱警问及我未去观看电视的原因,因答复只是‘不想去’,我被关押在禁闭室,还特派两名狱警监视,其中一名是林周县藏人扎西多吉,另一名是昌都县晋美南杰,后来又增派了一名叫阿依布的回族人。那天马队长前来让我穿好衣服(当时我光着上身躺着),他说:“监狱长李波(音译)要见你,届时要好好表现,千万不要闹事,否则会吃亏的。”我回应‘是’,就一直等着见监狱长。不久,监狱长在训话室接见了,那儿还放着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我坐下来后,狱长对我说:“晋桑,你长期在狱中,身体有病,这是事实。我们正在考虑你的事情,针对你的病情准备进行治疗。下面我将要提出的问题,你要仔细想清楚后再回答,好不好?虽然,目前你被关押在禁闭室,但我们准备将对你进行宽大处理。”我对狱长说,‘是’。“那好,现在你可以走了,以后我们可以再见面。”说着狱长也走出去了。当时,我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但捉摸不透其中的原因。

2001年9月底,大概是28或29日,监狱长李波和西藏自治区法院院长洛桑一同前来传唤我。我前去监狱训话室时,桌上意外地摆满了零食和饮料。平时服刑人员到室内不应许坐下来。今天,他们却让我坐下,这很反常。李波对我说,之前说过我们很关心你,今天法院院长也一同前来,要向你提一个问题,你要好好答复。他没有告诉我是美国大使馆,或者什么组织,或是个人,“他们正在为你申请保外就医,我们也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准备让你前往美国,你觉得怎么样?”我通过洛桑翻译,感谢他们关心我的病情。

狱长继续对我说:“你要写好保证书,出去之后就不回来了,并要签字。”当时,我不知如何是好,这句话让我感到很惊讶,我急忙对他们说,你们讲的这些话我无法理解。旁边法院院长便对我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我们是让你自由而不是惩罚你,回去好好想想。”就这样,给了几天时间让我考虑这问题。

大约在七八天后，再次被他们叫去，问我怎么打算，决定好了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可轻易妄动。我想，这也意味着自己流放自己。便答复他们，我是因为主张西藏自由独立入狱，而不是因犯法入狱。今天在座的俩位是主要领导，我想您们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这就等于自己流放自己，我不但很悲观，而且我还要在永不返回的保证书上签字，这恐怕办不到。法院院长洛桑唾骂我：“你很下流，如果这点都难着你了，那就写不去美国好啦。”一般而言，让我保外就医很感激，但说不要返回，那就不去了。就这样写下来后两人带着那字条离开了。截至 2002 年这件事销声匿迹了，无人问及此事。

2002 年 3 月 30 日，法院院长再次前来找我，他对我说：“你给别人说平常去藏医院看病，今天也要去看病，跟我走吧，被褥不要动，原地放好，万一你需要住院，他们会送过来的。”让我坐进一部小车离开了监狱，到邮电大楼附近时，洛桑转过身问我，“晋桑，现在外面怎么样，发展的好不好？”我进监狱之前这里是一片空地，现在可发展的这么快，我知道他需要这样的答复，可是我保持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洛桑又对我说：“今天你可以到亲属那里去住，但不要乱讲话。”我还是继续保持沉默，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就到了住在拉萨雪康色第三排，本人亲属家。“你就住在这里，以后需要看病什么的，就通知我们。”此时，几名警察领导也前来接管我。我告诉他们，这是释放我吗？可是，这样我住在这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吃饭看病都需要钱。我跟亲属也只是偶尔见面，彼此不太了解情况。所以，还是带我回监狱吧，我不想麻烦他们。当时我的亲属流着泪说：“您千万不要这样讲，赶快先换件上衣吧。”就这样，我便留下来了。这些是我离开监狱时的简要经历。



美国人乔·克姆(JOE KEM) 和达那·晋美桑布的合影

2. 如何抵达美国

提问:已经了解到老师已出狱，那您是如何抵达美国的?希望您能讲一讲这方面的事。

答复:公元 2002 年 3 月份，我离开监狱约三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一位称乔·克姆 (JOE KEM) 的美国人 和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一同到我的住处。这名美国人问我，我们为你争取保外就医，可是听说您不想去美国，这是怎么回事?我如实地回答需要写不再返回的保证书，因为这样我就决定不去美国了。如果你要带我走，我就跟你去美国。这名美国人说，这样就好了，你的签证问题我们会负责同公安部门联系办理，公安部门会对你发护照的，这些方面请不要忧虑，放心好了，等到了美国我们会再见面的。我们一同留影后他就离开了。

此后，于 7 月 7 日或 8 日左右公安厅打电话到我住所，告知他们已决定晋桑去美国了，离开之前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要求他们，在我离开之前，请允许我前去朝拜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如果这样不行，那么，带我朝拜大昭寺、布达拉宫和诺布林卡。答复是，可以去朝拜大昭寺，布达拉宫和三大寺不能去。

8 日早晨，来了一部警车带我去朝拜大昭寺，顺便前去罗布林卡，之后又带我去布达拉宫广场，类似几分钟散步。

3. 抵达美国的详细经过

提问:老师决定前往美国后，请谈一谈您到美国的详细经过。

答复:7 月 10 日下午 2 点半左右，公安厅一名官员和两名普通警察，及一名自称是医生的华人来接我。当时因在中共监控下，我的亲属们不用说为我举行欢送，甚至献个哈达都没有办到，百感交集大家只能含着眼泪默默无语做告别。此刻我也认不住眼泪，以及因哽咽说声“再见”都没有说成，立刻被拉进一部车，就这样离开了。从拉萨到聂唐，南木，江麦，雅鲁藏布江大桥，罗松布到达贡嘎机场，5 点左右坐上飞机后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就到达成都机场。在成都休息约 40 分钟后继续乘飞机到了北京。

4. 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

提问:当时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复:在 2 至 3 小时的飞行过程中一杯水都没喝，所以不需要上厕所。从机窗看到西藏的山水湖泊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坐在我身边的几位警察说，要好好看一看，我什么都没说，安静地呆着。有时能看到地面上的个别大湖，当时我心里想，唉!现在我就这样离开自己的故土了，因而深感悲伤。

同时，回想到公元 1949 年中共开始入侵昌都，之后以签署所谓“和平协议”为借口抵达西藏。公元 1956 年开始对理塘和甘孜实施残酷政策，并轰炸理塘寺，以卫藏地区“四水六岗护教军”作为借端进行残酷镇压。公元 1959 年，对西藏民族公然采取军事行动，不仅践踏了西

藏人权，甚至现在对本人也以保外就医为借口，被流放异国他乡。想到这些，心中对中共激起极大的愤恨。

5. 抵达北京后的感受

提问：老师您抵达北京后有何感受？

答复：我抵达北京后，第二天早上想要出去散散步，准备出门时发现因担心我逃走，门被锁了。这样，不得不呆在宾馆内。当时，发现我旁边一张床上还躺着一名警察，他告诉我：“今天我们会带你出去参观，你以前去过天安门广场，可以看看有什么变化，现在好好休息，明天就要出发了。”

当天带我参观天安门广场时，发现悬挂着的毛泽东相没有变动，可原来的那些平房已经变成了高楼大厦，还修建了一栋高大的所谓“人民大会堂”。让人惊讶的是，1957年我到这里时，小轿车很少，过往的一二辆小车，听说是官员的车。可是，我在2002年又到这里时，看到一座桥上面挤满了小车，还堵车，中国的发展就这么快。当时还因准备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修建很多大楼。我想，外在物质方面中国真的发展了，如果西藏也像内地一样能够发展该多好啊。无论哪个民族都需要发展，这是事实。

第二天抵达飞机场时，护送我的那名警察拿出两条哈达，让我献给前来机场的两名统战部华人女士，并向她俩表达感谢。我却对他说，这是她们自己走来的，我感谢什么。他说，一定要表示感谢，我也会代表你的亲属向美国人献哈达的。最后，我给两名华人女士献了那两条哈达后，用汉语说了声“再见”，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6）离开北京飞行西方

提问：老师您已经讲过抵达美国前的经历了，下面希望老师介绍一下出狱后，离开西藏前往美国的感受？

答复：我想，简要地讲，这是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对一名藏人为所欲为地进行监禁和蹂躏后，最后被流放。却不是考虑到藏人的利益而为之。因此，对于我的释放，我无法感谢他们，也无法表示这很好。

当我爬上飞机阶梯看到这么大的飞机时，发现这比拉萨飞来的那小飞机大很多，以及其设备等，想象出美国这个国家名不虚传，看看这惊人的飞机，就知道它比其它国家发达。

走进那个大型飞机，仿佛走进了建在地面上的一栋房子。在我旁边有一名驻华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他能说中文而不会说藏语，他用中文向我，怎么样？肚子饿不饿等诸如此类问题。我对他说，我需要上厕所，他就带我去找厕所，我对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只能听懂一点中文，更不会说英文，他说没关系，他会帮我。

飞机抵达美国芝加哥机场时，我的亲戚格桑拉姆前来接我，同她一起的还有一名韩国裔美国外交部工作人员。从这个机场到首都华盛顿需要换乘一架小型飞机，准备走进机舱时自由亚洲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前来问候。因格桑拉姆是自由亚洲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通过她的电话，对我表示问候，扎西德勒！藏人行政中央现任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和嘉日·洛追坚赞仁波切也要

问候我。不一会儿，耳机中传来桑东仁波切和特使嘉日仁波切的声音：“对你的到来深感欣慰，抵达目的地后要好好休息，我们将会向尊者达赖喇嘛禀告此事的。”我立即向他们询问了尊者达赖喇嘛贵体状况。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离开西藏时听说，尊者达赖喇嘛贵体欠佳，藏人人为此念诵十万遍渡母经，这一不幸消息。但他们二位的回复是尊者贵体安康，根本不用担心，因而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芝加哥机场休息时，看到奔流穿行的小型车辆如同蚂蚁，目不暇接，使我感到很惊讶，同时也认为强大美国因该是这样。此刻我又想起自己已经离开故土西藏，身在异国他乡，日后还能否返回西藏很难说，想到这里内心不由地生起一种悲伤之情。

当乘坐一架小型飞机抵达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机场时，在那里我的侄女格桑拉姆和她的丈夫、长子，还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副主管，自由亚洲电视台的记者等前来迎接我，他们在我身上披上了西藏国旗。在机场的服务程序中向老年残疾人提供轮椅服务，我也坐上轮椅出来时，他们关切地问起我的腿是否致残了，我答复腿很好，没事，因年纪大他们帮我，被这样推出来了。当时他们还赠给我一张尊者法相，我接过法相安放在自己头顶时，记者就开始拍照。后来那张照片遍布各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时，我住在侄女格桑拉姆家，他们告诉我：“你在这边住几个月都行，生活各方面我们会照顾的。”

第二部分: 抵达美国后的情况

1. 会见政要人士及介绍西藏问题

提问: 老师您抵达美国后, 谈谈具体做了那些工作, 如; 介绍西藏问题和境内政治犯状况, 以及如何同国际援藏各组织进行联络等情况?

答复: 我抵达华盛顿后休息了几天, 之后美国援藏组织方面, 向美国人权组织负责人和外交部等介绍西藏问题和政治犯状况等安排了一系列演讲活动。2002年8月1日, 在会晤美国外交部人权组织秘书长助理罗然斯先生时, 由特使嘉日仁波切,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 以及我的侄女格桑拉姆等陪同我前去会面。罗然斯先生说: “我们平常同中国政府开展外交活动时, 常常呼吁他们要改进西藏人权, 相应中方也做出了承诺。你一定会很快将得到机会能够返回西藏。在此期间, 祝你愉快, 并在各方面要好好学习。”



同美国外交部人权组织秘书长助理罗然斯(26)先生和特使嘉日仁波切,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 侄女格桑拉姆等留影

中共当局不承认我们是政治犯, 还指责我们这些政治犯是反革命, 更不会对政治犯当人看待。因此, 可以说在中国所谓人权毫无可言。之前我被关在监狱, 有一次, 在毒打一名汉族刑事罪犯时, 那犯人用中文说对狱警说: “犯人也是人……”当我听到这句话后, 有种莫名的感觉, 毋庸置疑犯人都是人, 但这说明了在中共监狱里犯人不当做人看待。在此之前, 我还没有考虑过中共监狱里对犯人是否有人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西藏没有人权的有力证据, 狱中更谈不上人权, 对犯人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 特别是让政治犯穿上带有花纹的上衣, 并为所欲

为地每年更换。这方面你们之前也向中共当局提过，我想今后还要多提一提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被送到这边来，这似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在遵循联合国各法律法规和尊重人权而作出的一种行动。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最后他们也有这样的表述。这些都是因为你们的压力在发挥作用，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我呼吁大家继续关注和解救仍在监狱中的洛桑丹增、索南次旺，珍噶、阿泊罗追等政治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有索南次旺的记录，因为在联合国代表参观扎基监狱时，他开展过对中共的抗议活动)

这期间也会晤了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杜兰斯科女士，她是美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她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与西藏状况，对西藏问题发表过很多文章。当时她对我说：“这是你们经过长期付出的艰苦努力而取得成绩，才来到这里。至今中共方面没有做出宽容和谅解，我方仍然希望中共当局同尊者达赖喇嘛面对面地进行和谈，并为此做出了诸多沟通。然而，中共方面还没有任何回应。无论如何，相信总有一天会有结果的。”她还安慰我，你也尽快能够返回家乡的。我对她说，能够返回西藏充满信心，感谢你们对西藏的鼎力支持，希望未来也能够继续提供帮助。据说，我能够来到这里是因为中共当局尊重人权，但事实上中共当局是为了阻止我将成为世界上服刑期最长的政治犯，而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让我到这里的。

2. 治疗疾病并同当地民众交流

提问: 老师您来到美国后同民众间的交流，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情况怎么样？

答复: 如同上述，来到美国后拜访了一些高层人士，除此之外个人方面也出了一点事。中共当局让我前往国外是因为我患有肺结核，提供保外就医让我到美国。为此办理了出国的各项证件，抵达美国后被安排在与肺病有关的医疗处，并不让同其他人员进行接触，甚至对我进行治疗时医护人员也带着口罩。故此，感觉很不自在。但住院十天，经医生的认真诊断，确定我的病不是结核等传染性肺病，服点药就可以得到治疗。住院等所有医疗费都由美国人权组织支付，在住院期间还安排了翻译。总之，各方面都提供了极大帮助。

此外，与民众交流方面，接受自由亚洲电视台的采访，也同其他媒体进行会面并拍照留影。华盛顿西藏协会对我因多年在狱中受难而颁发了奖状，当时该协会会长称南卡。

期间，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出席了一场有关西藏问题大会，会上他对我也颁发了奖章。当时，我深深感到原来境内外藏人是如此同心同德，相濡以沫，共同反抗中共，对此由衷感到高兴。还有华盛顿藏人协会特地为我举办了一场晚会，在晚会上不但对我进行赞颂，还有很多人士前来看望我，并向我赠送了许多礼物。

特别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阿旺热杰先生特意从纽约赶来，参加这一晚会，一同欢歌载舞，向我表示隆重欢迎，对此深表谢意。还有藏人行政中央官员，以及为西藏事业奋斗的所有人士抽出宝贵时间对我进行欢迎，并向我提供帮助，使我深感欣慰。上述这些是我抵达美国后的简要情况。

3. 从美国前往瑞士

提问: 请老师简要地介绍一下您从美国前往瑞士的相关情况？

答复:前面已经讲过在美国逗留期间的一些情况，若继续住在美国就需要申请流亡证件，如果选择返回，还没有得到完全治愈，最主要的是服刑未滿期，回去就要继续坐牢，(我在前往美国时还有9年刑期。如果没去美国，一直服刑，就要到80岁才能刑滿获释)就算回去，我也是无家可归。

我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是6个月，此后我准备在那里申请难民证件。后来见到驻美国瑞士大使馆一位官员，他表示，你愿意到瑞士来，他们可以对我颁发难民证。当时我觉得这事来的有点蹊跷，可是后来才想到，1992年，某一外国代表团前来参观监狱时，借此机会我喊口号，表示抗议。后来听说那批外国人士对本人做了大概了解后就回国了，现在我才知道那个参观团是瑞士人权组织部分成员。看来我从那时候就“投奔”他们了。

我想，对我提供难民证方面，是否通过我们的驻外代表进行商定。几天后，我收到了发白瑞士的一份邀请函，那是我目前居住的日贡寺发来的，信中表示：“如果您愿意到瑞士来，可以居住在日贡寺，我们欢迎您到这里。”按瑞士的避护政策，如果一个人要流亡瑞士，首先需要任何个人或团体的邀请，抵达瑞士后，才能申请难民证，或者直接进入该国后申请难民证。日贡寺也不例外，按瑞士的避护政策给我发邀请函的。有一天，无意中特使嘉日仁波切莅临我的住所，得到一次畅谈的机会。

当时，嘉日仁波切问我：“我们想尽办法让你到这边来，可是你不想离开监狱，这是怎么回事？”也许人很有可能认为，我在狱中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事来的样子，而没有多谈。我便对仁波切说，今天，仁波切提及这个问题，这很好。我在离开监狱之前，狱警对我说，不知是美国政府还是某一个人，他们提出让我保外就医的要求，他们批准我可以保外就医，但是，让我写好不再返回的保证书。我回答他，我无法写出这样的保证书，如果让我写这样的保证书，那么，我就不去美国了。当时，我也是这样写的。当局好像把那东西寄给您们了。

嘉日仁波切表示：“你在美国能得到难民身份证，可是，依照美国的法律可得不到任何待遇，从得到难民身份那天起就要从事工作。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不但很难就业，而且得到这个机会也很难工作。这就需要找一个资助人，但资助人也并不好找。因此，你去瑞士，那里能得到优厚的难民待遇。依我看，你还是去瑞士好。”这样，便决定将前往瑞士。

2002年8月15日抵达瑞士机场时，瑞士外交部一位官员前来接我。同那位官员一同走出机场出口时，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其美仁增、日贡寺堪布、日贡寺施主昆先生（音译）、瑞士藏人协会会长，西藏妇女分会和西藏青年分会会长，达赛次忠等人士前来迎接。此情此景，我想对一个平凡的人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藏人行政中央各代表和民众的如此关注和支持，使我感动的几乎流下了眼泪。

事实上，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却被中共当局视为重犯，不得已被关押在监狱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功绩。我只是高呼“西藏独立”口号，让中共当局产生反感而已。除了这些，我可没有值得一提的在狱中受折磨和关押过程的动人故事。

刚到达瑞士我的老病又复发了，瑞士医院同美国医院取得联系后继续为我治疗肺病，不久病情得到好转。公元1983年至2002年，在这长达19年中，因中共侵略者践踏人权对我进行残酷折磨，我的左眼已失明，但始终没有得到治疗，这就是冷漠和虐待政治犯的有力证据。而在瑞士不惜花费数万瑞士法郎为我提供了手术治疗，我深深感受到尊重人权的美德都体现在西方国家中，再次表达由衷谢意。

于2002年8月份抵达瑞士后，于9月17日，不同于其他流亡者本人优先得到了该国难民证。之后瑞士外交部副部长，从前到西藏视察监狱的人权组织成员等特意来到我的住处，向

我赠送了一只家用钟表和记录瑞士历史的光盘。还表示：“今后需要任何帮助，通过藏人驻外代表机构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会提供帮助的。”

当时，藏人代表其美仁增先生帮我提供餐食和负责翻译。瑞士政府对我提供如此优惠的原因是，公元1992年，瑞士人权组织五名成员视察西藏第一监狱（扎基监狱），当时本人因生病治疗被安排在队里休息三天。这期间，我得知有视察团将要来临。我所在的第一队正好是安排视察团视察的对象，每人床上有两张新被子，但这些都是摆设品，晚上仍然要用旧被褥，同样在食堂内也准备了猪肉和蔬菜。无论是哪里的外国人，只要来临时，我就做好用英语喊口号的充分准备。那天早晨九时许，我所在的队员就在炊事员宿舍顶部，便把我们都集中关在炊事员宿舍内。那间房门扇上方留有一个监视孔，我站起来从那监视孔向外偷视时，看到带相机的几个外国人走过来了，便立即用英语高呼“西藏独立”口号。这时发现我旁边已安排人员在监控我，那人叫边巴，另外一个叫本噶。他们两人用力拉我，我没能再喊出更多的口号。那次，因他们认真监控我，最后对每人减刑三年。

事后，瑞士视察团认真了解了狱中喊口号的那个人，最后得知那个人是我，便回国后向瑞士人权组织、瑞士西藏协会、瑞藏友好协会等方面做出了反映。这次便对我给予这样的特别关照。

后来，我从第五队政治犯移送到第一队。原因是，如果我留在第五队担心将对其他人员会带来不良影响。第一队的犯人都是缓期两年执行，或者是被判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显然，我在那里没有活动空间。

由于1992年因那次国外视察团面前喊出口号后，我被关在禁闭室。这期间，没有发放冬衣和提供饭食，几乎被寒冷和饥饿夺去了老命。幸好，这期间在禁闭室附近举行了一次大会，我从禁闭室高喊：“冻死人了！”“对我没有发放被子，冻死人了！”“共产党让犯人活活冻死吗？”“这是共产党所为的‘人道主义’吗？”当时所有的犯人和监狱领导都听到了我的呼声，立即派狱警队长到禁闭室。“不要叫啦，被子和饭食都会送来的。”不久就送过来了。由于那次喊口号，结果被加刑八年。

公元1993年5月份，从禁闭室转到第九队，那里狱友有玉罗·达瓦次仁先生、贝登嘉措先生等，共有三十人。他们都是老犯人。贝登嘉措被释放时，我的判决书装在他的保温瓶外壳和玻璃瓶间带到监狱门外，后来这些材料都被流亡行政中央安全部收到了。

那些老狱友各个都见识广，有胆量，能自主的人。比如；玉罗·达瓦次仁先生在1959年最严峻时刻，在拉萨小昭寺激战中腿受伤，我亲眼目睹了其伤痕。1988年，在拉萨举行的和平游行中，再次被捕。狱中他和我们在一起。还有贝登嘉措先生，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立下功勋。对于本人的情况，贝登嘉措先生了如指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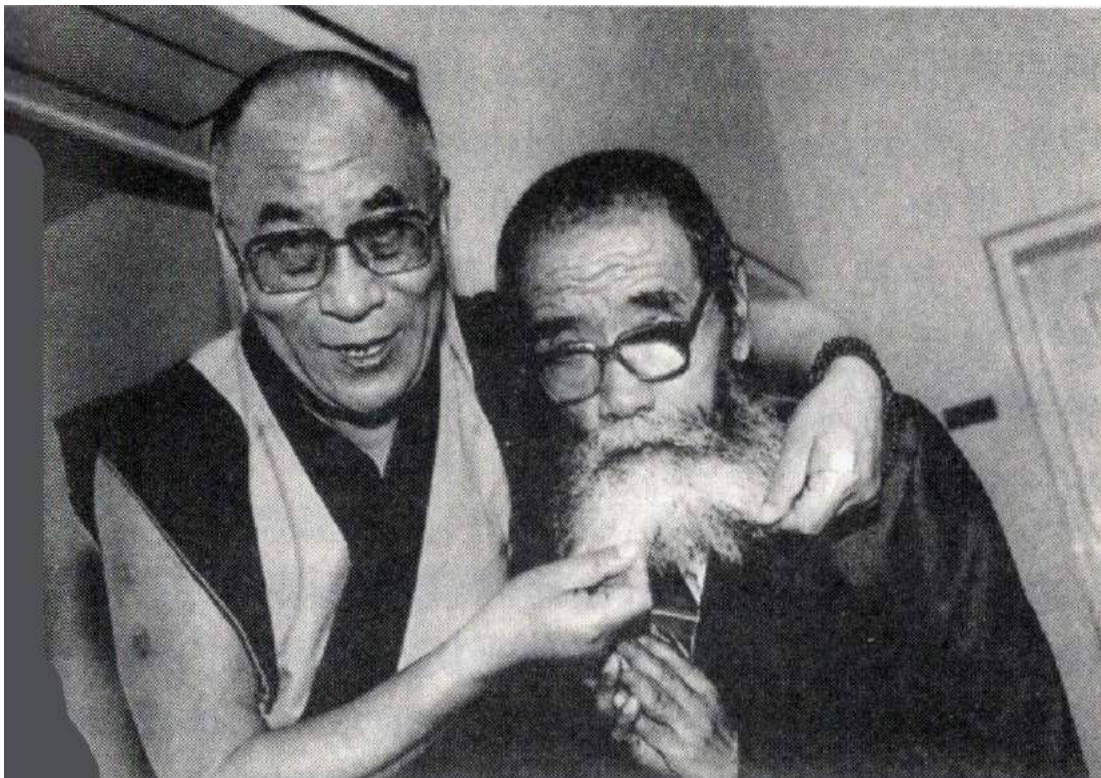
4. 第一次荣幸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

提问：老师，您到瑞士后作了哪些工作？

答复：刚到瑞士老病复发，经过良好治疗，现在肺病痊愈，可以说已完全康复了。瑞士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权的国家。我在中国狱中度过了整整三十二年，在这过程中，也就是从1975年至1980年间，我的一只眼睛出现了白内障，后来更糟糕两只眼睛都出现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了。1980年，本人一时被释放后，我的一位亲戚带我到医院解决了左眼的白内障，右眼也准备治疗时，我认为左眼能看的见就行了，右眼不见也无妨，就这样搁置了。此后，本人再次被关进监狱时，只靠左眼。就这样截止2002年右眼一直处于失明中，到瑞士后首先治疗肺病，肺病痊愈后，医生又建议要治疗右眼白内障。现在戴上眼镜远近都能看得见。所开支的医疗费用达几万瑞士法郎，实在恩惠极大。

2002年10月，在瑞士邻国奥地利境内，尊者达赖喇嘛举行一次时轮金刚法会。本人提出请求将参加这次法会，出国证件和签证等如愿以偿了。抵达奥地利后，法会还没有开始，本人于2002年10月5日很幸运地优先得到晋见尊者的机会。此生初次到尊者足前，内心悲喜交集，顿时热泪夺眶而出。首先按西藏本民族传统，对尊者进行顶礼时，尊者表示：“不要做礼拜了，请进来吧。”进去后让我坐到椅子上，我便面对尊者盘腿坐在地毯上了。那是一次难忘的晋见，并得到尊者的谆谆教诲。

那次，尊者主要询问，在狱中遇到那些困难，如何克服困难等问题。我对尊者说，狱中受难在所难免，其中最主要的是，监狱里没有人权，尤其是对政治犯不等人看待。另外还禀告了对于那些仍在监狱里受苦受难者情况，并把一些名单交给尊者，请求联合国出面解救。最后，尊者指示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尊者把手臂搭在我的肩膀留影时，我又泪流满面，激动的说不出一句话。



2002年10月5日，初次与尊者单独晋见时留影

那年在时轮金刚法会期间就这样谒见了尊者，还接受英国及奥地利多家媒体采访。当时我的翻译员是驻瑞士代表秘书长布结的爱人洛桑卓玛。洛桑卓玛法语和英语都懂，在她的帮助下，奥地利某一大学校长 Roswitha Dietner 女士带我散步，还请到她家一同进餐。Roswitha Dietner 女士对我说：“联合国对西藏问题不够重视，他们把重点放在经济上，对政治不是那么重视，因此，联合国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在这个世界上对正义的捍卫者往往是知识分子。”

我在西藏时，有一位流亡西藏的德国人，称海因里希·哈勒，他是《西藏七年》这本名著的作者。我到瑞士后，不久哈勒先生也来看望我，他还开设了一座西藏文化展览馆，我也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哈勒先生的藏语很流利，我们交谈很方便。那时他已达八十五岁高龄了，但他还是再次参访了一次西藏，并围绕参访撰写了一本书。哈勒先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名登山运动员，因他是名人，发现哈勒跟阿道夫·希特勒留有合影照。中国政府曾在一些报刊杂上提出批评：“哈勒是希特勒的倭罗，达赖喇嘛的老师便是这种人。”尊者达赖喇嘛在西藏时，哈勒先生是尊者的第一位英语老师。上述这些是本人抵达瑞士的一些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初到瑞士时居住在那里的上千藏人同胞前来迎接我，在住院期间又来看望我，得到大家的极大关照。特别是亚洲自由电台记者日冈之子次仁彭措为主要的原该地藏人代表，议员次仁多吉、其爱人贝玛等，邀请我到他们家做客，还陪伴我到市场购物，自始至终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日冈之子在瑞士成立了一个称之为“西藏之子”的足球队。当初他利用民众集会的机会开包子馆，其收入作为足球队资金。后来，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它对流亡藏人诸多学校在提供援助。次仁彭措的父亲是一位藏文书法家，他为了发展流亡社区的藏文书法，出版藏文书法书刊，曾对达然萨拉方面捐助数万瑞士法郎。日冈对我也提供了不少援助。在此谨向该组织及所有援助者表示感谢！

2004年，去了一趟达然萨拉，该机票费还是由“西藏之子”组织支出的，他们还说今后还会继续报销，可是后来因难于启齿，妇女协会又帮我提供了费用。瑞士日冈先生有两个儿子，他们都邀请我到各自家做客，并一路上下接送，等等。居住在瑞士的藏人还表示：“您为西藏和西藏民族历经如此磨难，我们应当要帮您。”我对他们说，我没有什么本领，也没有立下什么大功，只是对西藏事业有那种热诚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一般来说，藏人的事藏人自己不办，由谁来办呢？我们没有办法推卸这个责任。无论如何，你们以这样的心态帮我，我感到很高兴，向你们表示感谢。

5. 供奉“凶天”及其释疑

提问：目前，西藏境内外都面临有关“凶天”方面的问题，老师对此有何看法？

答复：2005年，尊者达赖喇嘛莅临瑞士传授《入菩萨行论》法会，此后传授有关密宗法灌顶。在此之前，尊者发出声明：“若这里有供奉“凶天”者，请不要参加这一法会，否则会违背师徒三昧耶。”

当时，我考虑应该到法王尊前说清楚，要不就会出问题。便打电话给驻外代表，要求晋见尊者，告诉他我在“凶天”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教。我是那天早晨打电话的，中午私人办公室秘书长其美仁增到日贡寺找我。他告诉我：“您的事我已禀告尊者，尊者表示赞成。您现在可以到尊者下榻的宾馆，一定会得到晋见机会的。”

在法王尊前顶礼三遍后，禀告尊者：我在小时候跟随母亲到拉萨的道结庙“珠迪康瑟”拜‘道结’，长大后我自己到那里去拜。我们拜萨加派‘道结’，其原因是，祖业“达那庄园”离萨加寺较近，因而与萨加派教法建立广泛法缘，同时就产生了供奉萨加派‘道结’习俗。当时，尊者满面笑容地对我开玩笑说：“你骗我了，其实你这是在问我，你曾经是否供奉‘道结’？”“没错，从前我也供奉‘道结’，后来发现‘道结’确实危害我们，从而禁止供奉它了。本来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就禁止了……”近半个小时，尊者详细地作出了指示。当时，我又忍不住眼泪了。正如“发起恶愿对佛教……”这偈陀所指出的那样，供奉‘道结’对西藏政教事业带来危害。从前本人因愚昧无知曾供奉过‘道结’，从现在开始为了自己对西藏付出的微薄之力不失坏，为了师徒间的三昧耶不受挫折，在法王尊前，立誓永不供奉‘道结’而得到这样的机会感到无限欢欣。

另外，有一次在瑞士日贡寺，当地藏人自发式地举行永不供奉‘道结’的签字活动，本人也参加了该签字活动，从此内心感到很愉快。认为本人到瑞士的这八年中，为西藏民族的政教事业又尽到了自己余热的快感。至于参加示威活动方面，从2009年开始因年老体弱而无法参加，除此之外，所有活动都在参加了。

从前，在狱中自始至终反抗到底了，出狱后如同消散的彩虹，无影无踪，认为这样不好，便继续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这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宗旨。尤其是本人抵达瑞士后，得到首席噶伦的选举权而感到很荣幸。

在中共监狱里谈不上人权，毫无人身自由。如今因受藏人行政中央的恩惠，全藏人都享受民主自由，对此感到骄傲和知足。至于参选条件中，民众要交纳自愿税一事，初到流亡社会第一年本人没有了解到此事，之后每年都交纳自愿税。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连任时，本人得到选举权，并对桑东仁波切投了一票。

此后，第十四届噶厦组建过程中，首席噶伦候选人洛桑森格，他是一位西藏贫民的儿子，勤奋聪慧。发现他成就学业后愿意服务流亡政府，很有希望将会成为重要领导人而投票选了他。

抵达瑞士后先后两次参加大选。西藏民族能与时俱进，享受民主自由，是尊者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历代领导人作出努力的结果。为今后西藏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本人也能亲自参与而感到无比高兴。上述这些是本人抵达瑞士后的一些感受和活动情况。

6. 居住瑞士开展其他事项

提问：老师，您在瑞士除了上述这些活动之外，其他地区还作了哪些工作？

答复：我抵达瑞士后通过驻法国代表，联系法国援藏组织及东德国援藏组织等，主要针对这些组织提出的问题，宣传西藏境内政治犯状况，以及对中共当局的残暴行为尽力作了答复。他们对我提问：“当前，中共政府向冈底斯圣山修建公路，对此您有何看法？”我对他们讲，我们并不反对诸如修路等建设，反而表示感谢。我们所反对的是，中共政府强制改变西藏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良好传统，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被同化殖民，使西藏将变成中国历史上已消失的第二个满族。现在已经看到，在大量汉族的移民下西藏民族已面临灭绝的危机，从而避免这一危机做出呼吁，并对共产党提出一点要求。后来，我的这些演讲制作出光碟后，东德国援藏组织还给了我一盘光碟。

另外，通过驻比利时代表到该国，参加2003年的3·10抗暴纪念日，并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这一活动的主要组织者称阿贾·次仁强巴。2003年3月下旬至4月初，本人在联合国一次会议上得到演讲机会，演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共剥夺西藏的基本人权，使西藏人在中共的统治下，如同奴隶，任其摆布，毫无自由；西藏的生态环境也遭到极大破坏，一些珍贵动物面临绝迹；冈底斯圣山附近的四大河流被破坏，并为所欲为地开采矿物，等等。当时，驻瑞士代表其美仁增和一些西藏官员也在场。

此后，我和原政治犯彭措尼珍又到联合国会议厅演讲有关西藏境内政治犯的危机状况。当时由于时间关系，都做了同步翻译，我的翻译员是格达桑佩，尼珍的翻译员是格西坚贝森格，二位分别翻译成英语。这是第二次在联合国得到演讲机会。

此外，在西班牙援藏组织负责人 Alan Cantos 的邀请下前往该国。第一天，在该国人权组织展开演讲。第二天，以西班牙籍藏人图丹旺欠先生为主导，控告中国政府五位领导人活动中，本人及原政治犯贝登嘉措作为老政治犯代表，以及西藏青年会会长果朱·格桑彭措、西班牙援藏组织副组长，图丹旺欠先生，还有一位律师等，一同参加了控告活动。于2009年7月份，与一位女性律师和翻译员的陪同下再次到该地高级法庭，在法官面前告发中共对藏人，尤其对政治犯进行虐待的一系列行径。

第三部分：在拉萨第一小学担任教师

1. 第一小学及担任教师

提问：老师，以上是您到海外的一些活动情况，下面我要请教两个问题，其一、您是从1952年至1955年间担任我们的老师，当时拉萨第一小学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再来该校是哪一年建立的？虽然，我也是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但当时因年纪小，只知道那是汉人建立的一所学校而已。下面请老师简要地谈谈这些问题。

答复：这所学校是1952年8月15日成立的。当初还没有成立这所学校时，也就是其前身称“董事会”（音译），规章制度和课本制定出来后，正式成立了学校，称“色新拉扎”。当时该校成员有查珠仁波切、赤江仁波切、察荣·达桑占堆等。中共政府方面有张继胡（音译）等人。后来，该校校长称多吉次旦的一位安多人担任。

学校成立后却在普通藏人找不到老师，因此，学校下达任务，每一个成员要招来一名老师。当时，察荣介绍邦达秘书格桑，查珠仁波切介绍我到该校担任老师。我曾拜查珠仁波切为师学过藏文文法。后来查珠仁波切对我说：“我们准备要成立一所学校，但找不到老师，如果你愿意当老师，我可以推荐你。一般，学了知识能应用就好，我从小时候就体会到这一点。到这里学一点，回去只睡觉不应用就会忘记的。还是到学校当老师比较好。”当时我还懂一点数学，便答应担任老师了。

8月15日，学校正式成立那天，我们都被邀请到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建校典礼。这便是创建学校和本人如何担任老师的基本情况。

至于这所学校的所在地称“色新”，以地名学校也称“色新拉扎”。从前那地段属于一家贵族，后来被藏政府没收，作为父家庄园交给了达赖喇嘛。父家庄园当初搬迁到此地因需要修建，便把“色新房”出售了。父家庄园认为，如果“色新房”将修建学校，父家庄园愿意出售这地段给学校。最后，这里便修建了“色新拉扎”，其实该校称“拉萨第一小学”。

当初，该校的藏文老师有西藏政府公务员卡那达邦、玛夏甘巴、萨度仁钦、三名仲科（原西藏政府俗官。译者注），八名孜仲（原西藏政府僧官。译者注），还有十几个汉族老师。为了继承西藏与众不同的宗教文化，还从三大寺邀请三名格西。噶丹寺派来的格西是孜麦仁波切，色拉寺是卸任上密院堪布曲觉仁波切，哲蚌寺是格西罗丹仁波切。六、七个月后哲蚌寺格西罗丹仁波切因参加寺院福寿法会未能留任，哲蚌寺派来了另一位格西，本人对哲蚌寺格西交往不深。其他两位格西一直在该校任教，1956年后，又派到中学任教。

学校的课程安排是这样的，早上八点半开始，三位格西要对学生传授和念诵皈依经、文殊菩萨心经，以及其他经文。

教师的工资和学校所有开支都由中共政府支付，当时中共政府做得很不错，建校地皮，学生冬夏衣都是他们负担的。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据说，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以后将要带到内地。因此，一些学生开始退学了。这时，学校召开会议，会上称晋洛坚长官的一位负责人讲到：“别怕小石头被风吹走，即使吹走也不会落到你头上。中国人口太多了，而不是太少的问题。你们让孩子上学，我们不会带他们到内地的。”当时，社会上对我们学校的绰号是“多拉学校”，对老师们也称“多拉老师”（“多拉”是拉萨语，期求将得到什么的意思。译者注）老师的工资从八块大洋到三十块不等，当然，学历高的工资高，卡那达邦、玛夏甘巴，以及活佛格西们拿的工资多。

有关课程安排方面，首先上藏文课，每个年级都有藏文课，再下来是数学、汉语、藏文文法《树王论》。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等低年级没有汉语和自然科学课程，只有藏文和数学。

藏文课方面，从三年级开始上文法《树王论》，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要全面学习文法《树王论》。到六年级藏文有了一定的基础，便开始写作。五年级和六年级有自然科学课。所谓自然科学课是，比如：有关冷空气和热空气的形成原因等。另外还有音乐课。每年冬夏季带所有学生晋见尊者达赖喇嘛，并把平时学到的最好的歌曲和舞蹈，晋见日那天学生在达赖喇嘛尊前要演唱，尊者也非常喜欢观看学生表演的歌舞。

学校里对学生像从前那样打骂的现象不存在。如果学生违反纪律，就要在班上罚站，而不能打骂学生，甚至老师不能给学生显示怒容，学校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因此，学生很喜欢上这所学校，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太小，不能上学。但学生还是愿意上学。总之，社会上虽然存在一些风言风语，但总体上还是受欢迎的。

从前，藏政府有个孜拉扎的公立学校，该校课程有藏文文法《三十颂》和《音势论》、声明学、修辞学、梵文字体练习等。老师是山南闵珠林寺院老师来任教。闵珠林等寺院僧侣广泛地学习藏文文法《三十颂》和《音势论》、修辞学、历算、声明学等课程，还制作藏香。从前，寺院是主要的学习场所，西藏有学问的人都出于寺院。此外还有一些私立学校，其课程只是念诵藏文，会读就行了。学生稍有吵闹声，老师马上当头棒喝。

我们学校领导有藏人，也有汉人，对学生进行惩罚，或吹胡子瞪眼睛的现象可以说绝对没有。拉萨第一小学是1952年成立的，1956年成立了中学，其后又成立高中。其中学所在地是藏政府的一个林苑。所谓拉萨第一小学便是这样成立的。

2 . 参加工作队

提问：老师在校任教期间，于1959年西藏发生战争，以及民主改革等变革，当时老师还是继续教书，还是做了其他什么工作？

答复：1959年6月，正好学校放暑假，老师们都派出去做宣传民主改革运动。当时本人因肾脏病无法直立行走，工作队党委李书记根据我的身体状况派我到达扎寺，另外还派了五十多岁的贝玛老师。那时候，派到西藏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全是部长，和我们在一起的称张部长，

他是一位上海人，我们之间因语言障碍很难沟通。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校长仲强（音译），一位姓李的翻译员，以及一些中学生。

我们一到达达扎寺便举行了会议，会上宣布从明天开始就要进行民主改革了，改革的内容是学习“三个反对”和“两个减轻”。学习未结束前出家众都要老老实实留在寺院。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达扎寺及其附近的觉摩隆寺，工作期是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从九月份学校将要开学，因此，改革宣传期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一运动刚开始就要求民众中要涌现积极分子，可想而知，在寺院僧侣中出现积极分子比较少见。然而，达扎寺竟然出现了一名积极分子，此人称阿旺曲桑。他是一个爱好制造是非，胡言乱语的人。上面还对他发了一支枪，就这样他带领达扎寺僧侣。觉摩隆寺院没有出现积极分子，我们便从本校初中生中挑选了一个懂汉语的学生来带领该寺院年轻和尚，并专门成立组织，教育他们，过去老和尚对年轻和尚进行任意使唤，可现在这种行为是剥削压迫，行不通。

我们把达扎寺和觉摩隆寺院合并后分成三个组，第一组由两个寺的几位法师和领诵师等组成，其组长由工作队中贝玛多吉担任，民众代表由寺院僧侣旦增格勒担任。第二组组长由本人担任，民众代表是一位和尚称格勒。第三组组长是一名回族初中生，民众代表是谁现在记不清了。

如此分成三个组按上述内容进行学习，但是，达扎寺和觉摩隆寺这两座寺院中在宗教方面都没有出现反对的声音，大家都称“宗教信仰自由”。因寺院没有出现较多的积极分子，所以上述那名第三组组长回族中学生的带领下，对一些学生所谓“安琼”（小和尚之意。译者注）教如何进行批斗法。部分年轻和尚揭批寺院当权者，从前他们欺压毒打贫困和尚，逼迫他们离开寺院，抢夺剩余财富等。现在认为这是作威作福，专横行为。因此，少数掌堂师、经师等被遭到部分学生批斗。

其中多数问题是，由于从前学吹喇叭唢呐等法器时受到老师指责，如：在练习唢呐时装有沙子的布袋吊在唢呐尾段进行训练等，这些都归结为折磨虐待而加以批斗。奴仆也如同上述对自己的主人进行揭发。就这样，批斗大会进行了六七天。当时，寺院和当地政府真正有权势的人都跑光了，剩下的都是掌管次等权力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出家人，但没有穿僧侣服装。

奴仆们揭发自己的主人时称，让他们只穿白色藏服；完全不付报酬；住在下层黑暗的屋子；到了特别节日还不放假，等等。批斗会开了五六天，场景还是比较火热。寺院僧侣们可不像一般民众，批斗会上情绪不是那么高昂。某一天晚上，工作队主要负责人张部长召集会议后表示：“这样，你们的批斗会显得太缓和了，应该要激烈一点。过去曾留在自己心里的痛苦要在会上讲出来，把心病要消除掉。”这么一讲，一些年轻和尚高喊：“我有话要说……”会场顿时变得一片混乱。工作组干部又表示：“不要乱，不要乱。”其实制造混乱者是他们，无论怎样，寺院仍然处在和平气氛中。

当时，对本人和贝玛多吉老师各配发了一支手枪。第一天，我们都试着佩带了枪，从第二天起就一直搁在箱子了，没有任何危险需要动枪。另外，对一些和尚积极分子们也配发了步枪，晚上巡逻时他们都带着枪。这些都是当时达扎寺和觉摩隆寺的批斗和管控状况。

那时候，僧侣当中出现了一些回家（还俗）者，也有一些僧侣愿意继续留在寺院，留在达扎寺的并不多，觉摩隆寺院的法师及七名年老和尚表示将继续留在寺院。工作组提出：“你们留在寺院能自食其力吗？”他们回答“能自食其力”。我们部长说：“我们就要请示县级部门，县上怎么安排就要怎么做。”

愿意留在达扎寺的那几个和尚说：“现在我们无家可归，我们要怎么做，就要请求政府安排。”他们是该寺的领诵师和来自拉萨家破人亡的四个和尚，县上对他们没有安排工作，后来被带到一所农场。

此外，称阿旺曲桑的那名积极分子也是一名无家可归者，对他安排的工作是暂时管理达扎寺院。寺院内拉章（喇嘛府邸）的门被封了。我们的住所是原拉章管家的住所。寺院大殿交给阿旺曲桑管理，他们的生活费用全由县政府负担，并发放粮食、茶叶和酥油作为他们的工资。

1962年，我的一位亲属因生病需要我到达扎地区去一趟，当时我看到，原来该地区的奴仆们都住在达扎的住所，称阿旺曲桑的那个人是他们负责人。我问他们的生活费用时，称县政府提供。从寺院愿意返回老家的那批和尚在返回前需要填一张表，内容是，那些老年出家人在寺院时的情况，以及在批斗过程中的表现；对年轻出家人也进行记录寺院时的情况，经过学习后的变化和表现积极态度等，进行存案后张部长在上面还签了字。

我们在工作队工作期间，一些奴仆揭发了自己的主人，如：1959年2月10日，爆发了西藏自由抗暴，3月22日至23日，正式爆发战争。在此之前达扎寺大管家、藏政府秘书长姜登大喇嘛（布达拉宫东西两角楼都有姜登大喇嘛住所，因而称姜登大喇嘛。顶部角楼藏语为“姜登”），还有达扎喇嘛管家等抵达达隆扎地区，此后带着一些仆人经过曲水尼堂以南横渡拉萨河和藏布江。平常这里便是普通平民渡江地带。抵达江岸后称，现在所有奴仆都可以返回了。当时，我不以为然。后来，大喇嘛的一名仆人流亡印度后到了瑞士，他给我一本姜登大喇嘛的自传，从中就有如同上述的经历描述，我才相信当时那些仆人说的都是事实。按那些奴仆的称述，当时他们还带了达扎仁波切的袈裟。

1959年藏历2月7日至8日开始，战争似乎就要全面爆发了。人人自危试图逃命之际，那些奴仆如实交待他们前去护送“反动派”，还称：“若不老实交待，难过关”。对此我感到很惊讶。本人亲身经历的达扎寺情况是这样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发生其他事。据说，其他寺院发生过各类事宜，但达扎寺和觉摩隆寺院却没有。

然而，在中共宣扬的宗教信仰自由背景下，出现了一件新鲜事。当时，达扎仁波切转世灵童已到四岁，如今他是西藏自治区宗教部门的高官。那时候，转世灵童的保姆是两个女仆，那两个女仆与尼木寺的两个和尚举行了婚礼。奇怪的是，达扎寺有新旧两座大殿，新大殿内举行法会，旧大殿内虽然还有佛像、佛塔、佛经等圣物，但在那里却摆设了烟酒糖果等物品，并举行了她们的婚礼。婚礼宴会上我们学校张校长致词：“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我们按西藏传统对他（她）们献了哈达，以及表示“扎西德勒”之外，其他没有出现毁坏寺院的行为。

3. 从工作队返回学校及其感受

提问：老师从民主改革工作队返回学校后继续任教吗？除了教书之外还作了那些工作？

答复：1959年，对达扎寺和觉摩隆寺院做完民主改革工作后，学校即将要开学了，本人便请求返回学校，直到年底在学校。从1960年开始逐步扩建了第一、第二、第三学校。从这三个学校中各抽出两名教师派遣到拉萨市管辖的堆龙德庆县、达孜县、墨竹工卡县、澎波县、曲水县、当雄县，及尼木七个县。拉萨城关区正在建立民办学校，传达设立现代教育制。我和坚参曲培老师被分配到堆龙德庆和曲水县，其他的也被分配到各县。抵达各县后建立民办学校，分别负责各地区学校。教师工资不再由县政府负担。本人到堆龙德庆县管辖的五个区，分别同各村负责人商定后建立了学校。当时，农村几乎全是文盲，西藏各地寺院是传授文化中心，那里传授声明、修辞、历算及藏医学等。因此，一般出家人担任学校老师，学校没有教科书，学生升学到二年级时，我们申请县政府来安排课程。后来，拉萨市文化处召集所有老师讨论如何制定教科书问题，并编写出了几本课本。本人在堆龙德庆工作了近一年。

文化处表扬我工作突出，并让我到墨竹工卡县工作。1962年，我调到墨竹工卡县，那里不像堆龙德庆县，学校已经建立完备了，我给每所学校发了新课本，并到每个地区学校，教育学生早上要按时起床，打扫卫生，要孝敬父母等。当时一些地区并不稳定，墨竹直工地区从事牧业，因此，那里有“四水六岗”的人隐藏在牧民家中，据说，一些汉族工作人员被暗杀在澎波和墨竹工卡交界处。某一天，本人到日岗寺建立的民办学校时，途中遇到一名哭泣的女孩子，我问那女孩发生什么事？那女孩对我说：“我们的老师被反动派开枪，几乎被打死了，我要去报告解放军叔叔。”我对她说，那么，赶快去报告解放军。当时我也很害怕，但本人身着藏服，民众对我还是很友好。他们憎恨的是汉人共产党，对藏人工作人员挺不错，所以，我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称蔡科长（音译）的一名干部在召集民众开会时，突然出现一名骑手遭开枪，虽然，蔡科长逃走了，但地区变得仍然无法安宁。

尽管局势如此严峻，但还是建立了学校。中共宣扬他们是在服务西藏，但那些只是说一些中听的花言巧语而已，对藏人还是不信任。如：在日岗地区不仅部署了更多军队，而且在直工寺南部建立军营，在仲达的地方还新建了一所军事库房。那些便是1962年的事了。

1959年，宣扬要实行所谓的“三反对”和“二减轻”，后来还是没有减轻税收，只是变动其名堂，称“爱国公粮”对政府要交百分之一的粮税，剩余的粮食要出售，这也是上税，提出诸如此类的很多要求。

那时候，民众还要做汇报，如果照实说真话，就等于自找麻烦。因此，大家都报喜不报忧，尽说一些漂亮话。无论是汉族干部，还是藏族干部，人人都一样，不说真话。据说，共产党员不说假话，但说真话就有危险。比如：巴瓦·彭措旺杰，随便可以对你扣一顶帽子。

本人在县上工作期间展开了一项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运动。那时候，本人到民众中间同吃糌粑、同吃米饭、面食，以及同喝酥油茶。县上来的一位汉族书记不习惯酥油味道，而面临很多困难。那位汉族书记吃糌粑时先捂住鼻子再吃，他的这一滑稽动作常常使大家引起哄堂大笑。

年终结算去拉萨时，我的母亲也到拉萨市文化处找特辛处长，对处长说她只有那么一个儿子，把他派到乡下工作，对她带来很多不便，要求把我调回拉萨继续担任老师。不久按母亲的要求，于1963年我重新调到拉萨第三小学。

4. 以上工作方面的利弊

提问：以上这些工作方面有哪些利与弊？

答复：A 当初获释为一段；B 抵达美国为一段；C 从美国到瑞士为一段；D 到瑞士后晋见尊者为一段；E 担任小学教师为一段；F 担任教师期间做民主改革宣传工作为一段；G 去建立民办学校为一段，然后，分别谈其中的利弊。

当初获释的利益是，使我的身、语、意都获得了自由。也就是说，有了人身自由才到了海外各国，也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得到言论自由后，我可以公开地宣扬西藏问题，以及中共监狱里糟蹋人权等问题。心意获得自由后，按照自己的心愿，以胡锦涛为主的毁灭西藏文化和残害人类的帮凶得到控告。

本人获释的弊端是，如今我已八十五岁高龄了，相对经慎重考虑后认为，之前本人没有按照美国人乔·克姆的意思答应去美国，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这样，我就会打破世界纪录，将成为世界上服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但是，我获释后这种荣誉对西藏民族就不复存在了。

抵达美国和瑞士的利益是，一到美国就不仅能体会到名不虚传的感觉，与领导人会晤时感受到真正民主的风范。在这泱泱大国发达的物质基础中，既民主又一统，自由中又受法规制约，且充分尊者人权。聆教其领导讲话时，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星球一样。同时，联想到西藏在中共统治下唯命是从，始终要服从命令的那种皇朝式恶劣作风又浮现在眼前。

瑞士也是个充分享受民主制的国家，各地区间不存在民族矛盾，可以充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比如：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等，互不干涉，自由享用自己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那里经济发达，币值高，货币购买商品能力强，各民族间又是那样和睦相处。这对西藏民族也带来了深刻影响，瑞士藏人热爱西藏行政中央，每年自愿上缴爱国资金达几十万瑞士法郎，还在联合国日内瓦理事机构前，藏人家庭自愿自费举行各种请愿活动。认为这些行为难能可贵。

其弊端是海外藏人后代得不到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即使得到这个机会，也派不上用场。因此，海外藏人后代不懂藏语，少数父母找机会让孩子学习藏语，但孩子得不到应用的机会，学到的那有限的藏语用不多久又忘记了。这些孩子在语言上已经失去了西藏人的特色。

在瑞士初次拜见尊者达赖喇嘛时，如同久别的孩子重逢父母一样，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尊者也表示，我为西藏受苦受难，而给予极大关怀，并恩赐了一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唐卡，还亲笔题词：“祝愿达那·晋美桑布永世净善，佛祖保佑！达赖喇嘛”此生此世得到这样的圣物，实在不可思议，真是大喜过望。



尊者达赖喇嘛亲笔题词

在拉萨第一小学任教时的利益是，当初刚建立国立小学有汉藏两个民族的教师，大家都相互谅解，团结和睦，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这种优良行为好多年都坚持下来了。对于工作形成热诚勤恳，踏踏实实的良好风气。宗教文化方面也有所启蒙，同时也提升了西藏民族的意识。这所小学经多年为学习本民族文化打下了较好基础，应该说这些都离不开上密院原堪布曲觉仁波切、孜麦仁波切等大德之恩，以及所有藏文老师们辛勤付出的结果。

至于该校的弊端是，因为这所学校是国立小学，学校的所有开支都由中共政府承担。所以，在政治方面要承受很多压力和诱惑。学生升到初中后就要到内地去学习，从此远离西藏文化，成为中共的忠实走狗。因此，这些人成为毁灭西藏民族的工具，是中共的摆设品，是我们民族的败类。在西藏初建学校培养的学生几乎都是卑鄙之徒。

所谓民主改革工作的利益是，西藏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如同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从经济、文化、科技，以及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告别落后面貌，不同于旧西藏，有目的，有方向地得到发展，并为此开启了康庄大道。我们从这些艰难和不幸中得到深刻教训。

西藏是一个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弱小民族，然而，尊者达赖喇嘛能够扭转乾坤，广泛传播西藏宗教文化，这也是从西藏民主改革开始的。上述提到的一些不利因素在所难免，但从整体发展中要看到它的有利之处。

回首其弊端，感到最震惊的是民主改革刚开始，西藏色拉、哲蚌、噶丹三大寺为主的所有大小寺院，同期将要举行的法会被阻止了，以仪轨、长净、安居为三事的佛事活动在西藏中心拉萨消失了。在民众当中中共指定一些下三滥进行胡作非为，狼奔豕突，所作所为本末倒置。对此感到很痛心，切盼何时把这些豺狼能驱走。

从 1961 年至 1963 年三年间，食品布料变得很紧缺，政府对民众发粮票和布票以限制购买。以拉萨市为主的民众购买糌粑、面粉、酥油等食品，需要从政府部门销售处购买，否则就卖不到这些东西。城内外尽显饥荒景象，民众的饭碗已经交给了政府，吃穿都受到政府的限制，民众质疑这就是所谓的“解放”吗？当时民间还流传出这样的歌谣：

每当父母关怀时

对此不觉是关怀

他人前来“关心”时

才会感知父母恩

这种悲惨遭遇不仅仅是卫藏地区，也包括康区和多麦地区。一位老年人在拜见（第十世）班禅大师时祈求到：“请不要让佛法教法毁灭；请不要让雪域江山丢失；请不要让民众遭受饥饿。”那时候，汉藏各民族身心都受到伤痛。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出现了问题，苏联批评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而中国批评苏联共产党是修正主义，就这样，两个国际共产党之间出现矛盾。最后，据说苏共对中共逼债导致上述困难。

无论怎样，因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两个大党及其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后，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灾难，以及内战文革，使西藏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也是开始搞民主改革带来的恶果。

到基层建立民办学校的利益是，全西藏以创造性地建立民办学校，学校老师的工资由全民负担，主要来自学生家庭，学生外出采集草药，如：贝母、人参果等。如此自力更生，创建学校，民众对学校的负责态度也很不错。

课程只有藏文、数学、体育，及音乐课。学校老师大部分是来自寺院的僧侣，他们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与宗教有关的故事，这对学生留下了良好习气。另外，为了扫除文盲，利用晚间一小时在民办学校对当地青壮年民众教藏文字母。学生白天的课程，晚上教给民众，学生也一边帮他们学字母，一边自己复习，这对扫盲起了不少作用。扫盲一时被搞得轰轰烈烈。

其弊端是老师水平低，再加中央号召“除四害”运动。那时候，县政府又下令学生到田间进行抓老鼠，抓小鸟比赛。当时，还出现有人用小鸟的很多皮拼凑在一起做成上衣穿的恐怖行为。

5. 中共入侵前拉萨的各种议论

提问：至于老师在狱中的遭遇大概就讲到这里为止，今天要请教的问题是，拉萨及西藏其他地区临近中共侵略前对此有什么样的议论？

答复：那时候，本人正在拉萨。实际上从 1946 年及 1947 年开始在拉萨大街小巷都大力宣传解放军将进军西藏。做宣传的那些人是从前在西藏，会说藏语的汉人；同时，让格西希绕嘉措也做宣传。其内容是中共有数百万大军，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就要解放西藏

了。另外，还教育民众解放军进藏最好不要对抗，等等。外面有这样宣传，而内部也有不少传言，有些人说：“共产党不但会毁灭佛法，而且让出家众还俗，民众将会遭受很多打击。”也有些人说：“共产党有很多军队，实力很强，而且其背后还有苏联共产党在支持。如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壬申言教，‘西藏有朝一日将会无选择性地被中国共产党统治，佛陀教法将面临危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有些人还开玩笑地称：“共产党就要来了，共产党到来后，普通民众就能娶三大领主的女儿当媳妇喽！共产党来了好。”等等，有各种传言。噶丹波章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危机来临时大力招兵买马，当时还在西藏中层阶级中建立了所谓的“众扎玛盖”（军营），每户招兵一名，没有儿子的家庭要用财物支持。普通民众中还建立了“结尼玛盖”每两个兵差出一名兵员。后藏一些兵营调到了拉萨，平常在拉萨的纯后藏人组成的警察部队都调回后藏。当时，还有传言称：“班禅仁波切投靠共产党后，将带领一些汉人军队到西藏，要统一所有后藏地区。”从前，后藏和前藏高层闹矛盾，早已成两个派别。

然而，当时康区和多麦地区仍然在噶丹波章政府统治下没有动摇，因此，便出现了上述班禅仁波切要攻打拉萨政府的那些谣言。事实上，那时候西藏政府方面也不仅做了备战的充分准备，还把留在西藏的国民党代表都驱除出境了。与此同时也清理了共产党间谍和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那些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巴瓦·彭措旺杰，巴瓦的老婆称吴白玲（音译），是一名回族姑娘。巴瓦·彭措旺杰是1940年左右到西藏（拉萨），他在拉萨开了一家饭馆，问题却不少。有人说，巴瓦在那时候就建立了党组织，总之，他跟国民党格格不入，对拉萨的国民党代表很不满。因此，据说巴瓦晚上不敢住在家里，常常到拉萨郊区一起同乞丐睡在帐篷里。从那时候开始，巴瓦好像在执行什么任务，后来被捕时在他那里发现了一台电报装置。抓捕巴瓦的人是藏政府噶迪代本（“代本”是原西藏政府藏军军职，每一代本辖兵五百名，少于现代陆军两个营的兵力。译者注），当时，我就借宿在噶迪代本家里，噶迪的太太是本人的一名亲属。后来，代本大人对他的儿子和我各发了一支手枪，说：“拿走吧，也许可能会发生动乱，如果发生动乱，就需要它。”并对我们教了如何使用。

我和代本儿子出门时，巴瓦被一群藏兵带过来了。看起来巴瓦很雄壮魁梧，带到代本家后没有进代本房间，而把他关在仆人的房间里，还让我和一些仆人来看管巴瓦。后来又带到拉萨国民党代表处的无线电台发报室，那里全是国民党的人，藏政府限期让他们在七天之内全部返回内地。1947年，额外举行了拉萨大愿法会；斋僧大锅器口向下倒置等，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之事。当时，人们议论中共汉人就要到西藏，侵略西藏已成定局。

那时候，西藏政府也开始招兵买马，并建立了电台。电台新闻播音员是拉萨仲科（仲科是原西藏政府俗官。译者注）中有一位叫热萨嘉甘的人，他是藏语播音员；驻拉萨印度使馆代表日尔乎卜朵先生是英语播音员；代本达拉·彭措扎西是汉语播音员。他们播音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中共侵略西藏，我们将会对抗的，即使男尽女绝，臂完肩来抵，也会顽强抵抗到底。

最后，达扎摄政王辞职后，尊者达赖喇嘛接任西藏政教二职。当时，有些人称：“尊者达赖喇嘛是雪域西藏之天缘，是观音菩萨之化身。若尊者登基西藏政教二职，将会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无论怎样，拉萨有很多议论。尊者达赖喇嘛接任政教职位后，于1948年逼迫到

亚东避难。尊者离开拉萨时前来拜见他的信众人山人海，由于事先未做准备，此时局面一度失控，一时还宣布取消拜见活动，因此，不少民众在哭泣。

那时候，拉萨大愿法会期间伙房送水的全是女孩子。民间有传言，送水女孩当中也有空行母之说。她们在送水时一路上欢歌笑语，其歌词一般都是反映当时社会背景和事前推测未来之事的预言，民众对她们的歌词决不会疏忽。从前，达赖喇嘛尊者将会降生于安多达孜村之事便唱出了预言，其歌词是：

在那达孜山山顶上
盛开幸福的格桑花
要是次仁措姆多快乐
若是心中之花多幸福

其大意是，尊者达赖喇嘛将降生于达孜村，其母尊姓大名中有“次仁”之称。此外，反映有关当时社会状况方面的歌谣有：

花花绿绿一座寺
那是理塘府之寺
若要呈献礼和供
便可贡奉理塘府
青壮男子敬酒各一杯
青壮女子欢歌各一首
吾等少年不驻足
哪儿快乐至那里

其大意是，要离开不可停留之意。

汉地扁鸟汉地扁鸟
内地玻璃镜子之中

(含义不清)大意是，中国的镜子中将会出现怪异现象。

诺增瑟忠为前世之缘
雪啰莫啰科……

所谓“雪啰莫啰”也是不要停留，要离开之意。民众对此议论纷纷。后来尊者达赖喇嘛便前往亚东，拉萨对此举行诸多祈福禳灾宗教活动。当时，达赖喇嘛经过我的家乡曲水时，在那儿正举行绛普寺冬季法会，所有僧侣前去请求尊者不要起驾。达赖喇嘛对僧众说：“大家还是回寺院吧，不久我会回来的。”当晚尊者一行投宿在曲水，经师赤江仁波切也出面安慰僧侣：“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很快会见面的。”那时候，民众中对此事存在各种议论，有人说：“到亚东与中共谈判后，会和平解决此事的。”无论如何，当时中共军队已经抵达昌都了。

1959年，昌都被武力解放了，对此产生了很多议论。称孜仲坚参彭措的人是本人一名外甥女婿，当时他在昌都总管阿沛手下工作。昌都解放后他回到拉萨曾对我讲：“解放军抵达昌都时，虽然藏军跟他们进行了交战，在邓柯一带也跟解放军交战了。但结果因双方实力悬殊很大，战事结果可想而知。中共军队一部分从康区进军，一部分从安多西宁，另一部分从新疆经过申扎县进军拉萨。”

那时候，驻新疆美国大使馆官员被中共驱除出境后，美国官员经过西藏，途中架起帐篷休息时，藏军误认为中共军队，便开枪打死了一名美国人，从而造成很多麻烦之说。

总之，解放军抵达昌都时，阿沛已经逃到离三天历程之外的哲古寺院（今西藏自治区措美县境内。译者注），当时从昌都至拉萨的一部分军队到达哲古，另一部分军队从类乌齐也到达哲古，倒霉的阿沛便落在两路部队中间被捕了，同时还有其部下孜仲。被捕后阿沛没有带到拉萨，却反而带到昌都去了。在昌都解放军主管王其梅进行讲话时道：“我们兄弟民族之间按理就要友好会面，但因受外国人挑拨离间，逼迫用战争来相会，对此深感遗憾……”据说，王其梅说着说着哭起来了。就这样，阿沛被关押在昌都，截至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才动身前往北京。本来阿沛是个被活捉的败将，签订《十七条协议》后，才避免了战争，西藏社会动荡也有所缓和了。

6. 公元 1959 年前后的真实情况

提问：1959年动荡时期，老师住在哪里？请讲一讲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答复：59年我就在拉萨，那时期，本人因肾脏病卧病在床。我的家就在察珠仁波切府邸和拉萨色新小学附近。藏历二月十日早晨五点半开始就听到炮声，炮声和枪声接二连三响起来了。当时，在院子外面听到人们：“唉呀！不好啦，开炮啦，爆发战争了……”的仓皇声。母亲对我说：“儿子您躺着，妈到外面去瞧一瞧就回来，不用怕，我们这里比较安静。”早上八九点左右猛烈的炮声开始了，我家房屋朝西有一扇窗，母亲从那扇窗向外望去，看见药王山（拉萨布达拉宫西南一小山名，西藏四大名山之一。译者注）被大炮轰得漫天灰尘。母亲又把我扶到那床前，只看见喷发的火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转身重新躺在床上，母亲又从那窗口向外望去：“药王山被炮火摧毁了……”药王山被炮轰后开始向布达拉宫开炮。母亲流着泪对我说：“如果布达拉宫也像药王山那样被毁坏了，可怎么办啮……”她非常担心布达拉宫。正在这时，布达拉宫被炮轰的漫天是深红色灰尘。出现深红色灰尘的原因是，粉刷在其外部多年沉积的深红色染料被炮火冲击后出现这一现象。一会儿，我再去观望后发现，深红色的火烟大部分消失

了，但仍然还有一些灰尘。此后，又开始开炮了，那是向白宫开炮，空中又升起了白色的烟灰。三百年粉刷在其墙壁上的垩土沉积的非常厚，这样一开炮白色的灰尘就升向空中。然而，布达拉宫却巍然屹立，岿然不动。

在布达拉宫从前是所谓玉妥寝室的那房间，后来成了党委办公室，外面还筑有防御设备，看来中共有充分准备。十一日那天没有任何动静。十二日下午两点左右又响起了机关枪声音，十分钟后学校门口好像出现了军人，并开始砸学校门窗。不一会儿，我家窗户上也被开几枪，母亲急忙跑过来用她的身子保护我。如果那天到了死期，我和母亲就可能会死在一块了。开了好多枪，后来院子里发现满地都是弹筒，门口很多人在叫喊：“快死了，给我水喝……”一会儿又安静下来了。

这样，楼上的人都跑到楼下来住。当时，门外来了好多军人，他们用汉语叫喊：“开门，开门”。母亲认为，门打开比较好，要不他们开炮，里面的人肯定会惨遭死伤。门刚打开，外边用汉语叫喊：“里面的人全部出来，否则就要开枪了。”说着架起机关枪做好开枪准备。当时，我的朋友发现，外边那些军人正搭起人梯翻墙到民房内。我们家的房顶和院子里都站满了军人，一边搜索一边叫喊：“把枪缴出来！”和我们隐蔽在一起的察珠仁波切儿子曾经到内地学习，他懂汉语。幸好，为我们作翻译。我们出去，若不出去他们会开枪的。我们走出来后看到像是一个军官的人手中握着手枪，对其他军人发布命令：“进去搜查武器！”我们那个院子里别说枪支，甚至一把刀都没有。

后来，我们居住的左右民房内站满了军人，他们每家每户地搜查武器。没有打开着的门被砸烂了，去开门的人有的也被开枪打死了。枪声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当时抵抗中共军队的主要人员是仲科桑苏先生，那天他手中有一挺机关枪，便进攻玉妥防御区，开了好多枪。后来撤退玉妥防御区北部时受伤，然后在附近的居民家中躲藏了几天，最后不幸被捕，在中共狱中被关押了十二年。出狱后在西藏自治区政协工作，现在仲科桑苏可能去世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院子里的所有人，男女分开后各自集中到一起了。当时男性有六名，分别是，本人、萨希啦、次旦、旺扎、边巴，以及察珠仁波切儿子仁钦。我们排好后两个军人站在队列前后带我们到玉妥家院内，一会儿来了一名军官对我们道：“你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说着对我们进行了查身。我们当中萨希啦身穿缎子藏服，盘有发髻。那个军官对他发问：“你是不是那个第二代本？”最后，我们都带到拉萨司令部，从会议厅经过一个暗道，便到了一所地下室，地下室内可能有水，上面都盖着板子，再经过一条暗道，偶尔有点灯光之外里面还是很黑。一会儿，就到了军区司令部。从谭冠三司令员的住所门外经过一个广场时，听见拉萨市街上还不断传出枪声，有时子弹从远处飞到我们所在地广场上。经过那广场时，发现中共军队还在那里修战壕，上面用木料盖顶，修得很坚固。看来他们是怕外国飞机前来轰炸而修建这些，其实对抗他们的只是藏人，而藏人除了那几支枪之外，甚至一台象样的大炮都没有。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准备很充分。

然后把我们带到察荣府，在那里呆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对我们问道：“你们中间有没有懂汉语的人？”因仁钦懂汉语，便带他走了。他们审讯仁钦要老实交待，我们是什么人？有没有带武器的？仁钦告诉他们，我们都是普通民众，不要说打仗，我们中间还有三个病人，多数是

良民。最后，对我们开了个证明，说可以回家。那时候，拉萨进入大量军队，大街小巷搜查武器，军队都一个编制一个编制的，察荣府邸临时设立了司令部分支。当时，噶丹赤巴可能住在那里，也带出来了。

我们从达孜仓经过藏医院门口准备回家时，两个康巴背着战斗中被打死的两个中共军人的尸体，后面中共军人用枪指着那两个康巴走过来了。那两个康巴汗流浹背，口中不停地请求道：“行行好，快招架不住了……”那里还有像是乞丐的几具尸体和几条狗的尸体也在路旁。藏医院附近的拉鲁府邸中江拉珠古的奴仆好像在那里开枪打死了几个军人，原因是，一些军人拿着几顶军帽出来了，尸体很难运走，只好拿着帽子按编号上报。我们正要经过那里时被他们阻止了。赶快拿出证明书给他们看，一眼都没瞧，用汉语下令：“向后一转！”我们又被带到玉妥府邸门口，刚到那里，来了一辆车，二话不说，我们被推进那辆车到了诺布林卡。那天是藏历2月13日，一家飞机到拉萨上空绕了一圈便飞向山南方向。后来便得知，那架飞机是从当雄机场（拉萨市北部一县份。译者注）飞来的，主要任务是追击逃往澎波地区的藏军后，顺便到拉萨察看。

当我们抵达诺布林卡时，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里面还有几顶零散架起的小帐篷。那是“四水六岗护教军”和民众守护尊者达赖喇嘛时的住所，帐篷支架上还挂着经书和两三个麝香。我们被带到噶厦会议厅时，诺林高台上堆满了尸体，有些尸体没有头颅，每三四具尸体上还留着一条哈达。我身旁的那几个藏人还小声问：“这是怎么回事？尸体上还献着哈达，有些尸体头颅也没有。”平台上下大概有三百多具尸体，那些尸体全是藏人尸体，没有一具汉人的尸体。也许那里很有可能藏人对抗解放军，刚发生了一场恶战。

本来藏人拿枪准备与解放军奋战时，不料对方首先进行猛烈炮轰，使藏军成一盘散沙，然后开始全面进攻。当时，解放军进攻诺布林卡时，其四周围墙虽然很高，但上面都打了好多洞，装备简陋的藏军一攻即破，这样就打开了诺林所有大门。黄宫的围墙也被打出洞后，冲进来了。然后，又把我们带到目明宫，此宫殿有三层楼组成，炮弹击中了宫内的法座，窗帘也被炮弹穿破了。经过宫殿后门石阶，看到石阶顶部的汉式屋顶也被掉下来了。打开一扇较小的门，我们都被关在那里面，进去后才发现那里关押着上千人。那里人太多连躺下来的地方都找不到，其中大多数是藏军。

那天晚上，不但睡不著，而且旁边人群中不少病号，其中有的在不停地“哎哟”“哎哟……”地呻吟着。除了病号悲哀的嚎叫声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看守的解放军用汉语说：“不要叫了，再叫就要开枪了。”被关押着的人群当中，称藏医丹增曲扎的也在那里。

拉萨小昭寺附近有一家藏医院的药店，店主富人家的那个儿子也在这里。因他在我们旁边，一会儿便小声问我：“大昭寺情况怎么样？”我小声回答，大昭寺还好，虽然中了几炮，还是没有多大问题。他还说：“现在要小心喏，全完蛋了，要不就没人管了。”顺便还问我：“你们是哪里人？”我便对他讲了我们被抓的经过。后来，此人关在贡布监狱里，一直到1962年左右才释放。他家在第三小学附近，后来我们还见了面。

第二天，那里级别较高的军官前来查看我们，口袋里还有昨天发给我们的那证件。懂汉语的格桑仁钦被叫去后审问了近一个小时。当时人群中出来一名蒙古族格西，高喊：“我不在叛乱中……”没料到，那位军官用流利的蒙古语对那个格西讲话，看来他可能在蒙古呆过。那格西也带走了。查看完备后就放我们回家，并对我们说：“路上要小心，遇到军人要听口令，说不要动，就要原地站立，不能乱动，否则会开枪的。”就这样，普通人从北门放出去了，我们六个人从正门放出去了。我们排队经过恰果桥附近时，发现两个女孩的尸体漂浮在水中，这些可怜的女孩大概是出来背水时不幸中弹身亡。

回家路上也看到身穿皮袄的安多或是康巴人尸体。当抵达贡迪林府邸时，住在那里的工作队负责人王校长（译音）的回族人前来查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哪里去？”我们拿出证件给他看，便放行了，并重复了上一个军官讲的路上要小心的那些话。看来，我们从诺布林卡离开后，那里的军官给他打了电话。

我们从那里出来后，一路上除了尸体以外，什么动物都见不到，甚至那些小鸟也是静悄悄的。当我们经过拉萨雪石碑外侧进入拉萨市路段与自治区地段时，炮轰拉萨雪时留下的尸体有四辆马车被运走了，每辆马车中大概有十到十二具尸体。工作队的人员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到市内，到自治区那边比较好。”工作队还派了两个人来护送我们，当我们到自治区办公楼前时发现，有些窗户被炸毁了，这大概是藏军炮兵团干的。

到达自治区所在地再次查看证件后，带到拉萨察荣司令部，那里要走地道，经过地道到察荣时又查看证件达十多分钟，最后放出来了。带我们到自治区所在地的工作人员是藏人，从前他们是邮政人员，其中一个人我比较熟，便请求二位把我们送到家里，回答却是：“我们也有危险，没法送你们。”送到公路边，便对我们说：“从这里走，我们不送了。”我赶忙竖起大拇指请求他们：“劳驾！请送送我们吧。”最后，把我们送到家了。至于此事，萨希贡桑比我小两岁，还有我的各兄弟姐妹，我的叔叔扎西次仁，姨妈贝玛央金的女儿等，他（她）们现在都健在，能为此事作证。

7. 1959 年战后的拉萨状况

提问：请老师讲一讲，1959 年，对战后拉萨的状况您有何看法和感想。

答复：1959 年，藏人的反抗被中共镇压后，学校又开始上课了。学校正式开学后学生也很多，但学生当中除了他（她）们的母亲之外，能见到有父亲的学生却寥寥无几。同样，在街上人行中，绝大多数是女人，男人却寥若晨星，出家众完全消失了。这种异常现象给人的感觉是空落落的。

那时候，还在轰轰烈烈地展开着所谓“三反对”和“二减轻”运动，也出了不少积极分子，三大寺内举行问答等活动，在党的领导下涌现出学习热潮。除此之外，解决困难，发展经济等方面无人问及。当时，拉萨除了批斗，再也见不到什么。政府宣传中本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尊者达赖喇嘛被劫持到他乡去了……”并把劫持的场面用漫画形式画在拉萨马市的一面

墙壁上，其画面是尊者坐在上方，下面两个穿袈裟的人手握步枪，试图让尊者站立的样子。这张画挺有意思，看来拉萨全市都用这张漫画做宣传的可能性很大。

同样，在策门林寺院的门旁又画了一张乃琼护法的漫画，绘画这张画的人是安多著名画家强巴啦。本人到那里时他正在画那张画，画完后乃琼护法胸前的大铜镜圆中心本来有梵文“ཨྲ”字，但那张画中没有这个字母，民众就对强巴啦说，铜镜中要写上“ཨྲ”字。强巴啦说：“这只是一张图，不是正式的护法神。”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哈……哈……”地笑出声了。那张图下面还画着几个身穿皮袄的藏人，说他们是“四水六岗”的人。

就这样除了做些宣传之外，截至 1960 年根本没有发展的迹象。当时的拉萨变得灰蒙蒙，空荡荡的样子。拉萨摆摊的人也因无人光临，而失业了。政府对人们讲，你们最好到那钦尘地区可得到工作，如果不能到那里，就要参加即将要开工的拉萨建设工作（那时候所谓的建设是指拉萨市修建公路）。

1960 年，我到拉萨时，那里男女都变得很难分辨，女性穿藏服如同男性提起来再勒带子，然后戴口罩和头巾。从前，拉萨市人们显得很悠闲自在，现在却失去了这些，代替的是匆匆忙忙和动荡不安。

当时社会的优点是，展开“三反对”和“二减轻”运动，使所有规模较大的拉章（喇嘛府邸）的账本都被烧尽了，民众对此雀跃不已。因为，民众对贵族要缴纳的各种税项及旧债新债都在那里面。一把火烧了那些账本，从他们的祖辈一直留下来的苦难一下地全得到解决了。当时看到民众欢天喜地，认为这是一大优点。除此之外，1962 年至 63 年间民众充满恐怖感。按理解放了民众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解放藏人的却是中共，因而藏人还是一定不称心的。

第四部分：遭捕入狱

1. 每次入狱判刑情况

提问：以下对老师从三个方面请教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种原因入狱？第一次坐牢时有何感受？第二个问题是，请回顾一下坐牢时总体犯人的基本情况，有关被折磨、虐待啦等等。第三个问题是，犯人的一般生活状况。如：吃饭、穿衣等。再下来对上述这些问题方面，谈谈您个人的看法。首先请老师来简要谈谈您先后入狱的时日。

答复：本人当初入狱是在 1965 年 8 月 15 日，那天我入狱时他们对我说：“你犯了错误，有罪，所以，这次你需要劳动改造。”就这样被劳动改造三年。

第二次入狱是在 1970 年 3 月份，那次被判刑十年。第三次入狱是大概在 1983 年 9 月 9 日左右，那次对我判刑十五年。每次入狱都有不同的“罪行”。

2. 第一次入狱的原因

提问：请老师讲一讲每次入狱的主要原因。

答复：我第一次入狱的原因是，从 1964 年开始对第十世班禅大师进行批斗运动。当时，拉萨市两所小学和拉萨文化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召集会议，会上针对班禅大师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人批评班禅大师，并提出很多意见。会上记录员是我们学校的一名汉族工作人员李主任（音译）。会上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从 1959 年拉萨发生自由抗暴以来，汉人（指中共）极端压迫藏人，他们在西藏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因此，要相信汉人的所有言论，这我办不到。除了中央的指示以外，拉萨市官员讲的话，我没有办法相信。其原因是，尊者达赖喇嘛宣称是西藏自治区主任，1959 年爆发战争到现在却很少提及达赖喇嘛，后来达赖喇嘛出走后，班禅大师成为西藏政教领袖，中央也对他安排了副委员长的职位。现在，要揭批班禅大师，我可没有办法批评他，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当时，揭批班禅大师运动的同时还在搞所谓的“四清运动”。我这么一说，从政治上已成为极大危险分子，也成了扣帽子的最好机会。汉族官员对我说：“你是小班禅，你的成分也不是很清白。”最后，他们召开党委会议，并召集三所学校的老师，文化处所有工作人员，开始揭批我。

1964年3月10日左右通知我，要准备好被褥。这就意味着要坐牢。被捕入狱后，当初关押在扎基监狱，后来又说不行，被转到桑娅监狱。

3. 第二次入狱的原因

第二次入狱是1970年3月9日，入狱的原因是，所谓支持反革命分子，确切地说是因一张照片而入狱的。1960年，我和阿旺普雄老师、罗追老师，还有一位老师，共四个人身穿整套藏服，拍了一张留念照，后来记得我又把那张照片加洗了四五次。当时，我的一些学生在毕业前拿去该照片做留念。

照片到学生手里时还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拉萨市有些人暗地里成立了所谓的“小虎队”，政府发觉后调查这一组织，“小虎队”有些成员逃到中印边界被捕了。被捕的人员中间有我的几名同学，他们手中也发现了之前因师生关系我给他们的那张照片。当局发现那照片后，我被当作幕后指使者而被捕。

当时，学生们也没有什么与政治有关联的问题可交待，至于本人也同样，在审讯过程中没有任何可交待的问题。当局对我进行刑讯逼供，试图从我身上打开缺口。但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问题，至于那照片是何时拍的，可以问问那照片上的其他几个人就一清二白了。但，那照片到底在那些人手里，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说清楚。调查人员对我说：“一些中学生逃到中印边界后被抓，搜身时就发现了你的照片。”因此，他们以幕后教唆罪对我判了十年徒刑。

4. 第三次入狱的原因

本人于1980年3月9日释放后，于1983年9月9日再次入狱，那是第三次入狱，在聂塘砖瓦厂服刑，狱友有贝登嘉措先生和洛桑旺秋老师。洛桑旺秋老师入狱的原因是，他写了“历史明确证明，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标语，贴在人口密集的‘大理公司’门旁墙壁上。当时，当局用温和方式带走了洛桑旺秋老师，因而，他的这一宣传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洛桑旺秋老师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了刑。虽然，他的这一宣传对藏人的反抗斗争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因受当局的压力没有得到有效传播。此后，本人在拉萨八廓街东面和南面，大昭寺正门两侧墙壁上张贴了“西藏独立”的标语。当时，聚集了不少人，有些人还认为这很不错，正要起哄闹事之际，上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员赶到现场，他们只观看标语，没有抓捕我，对民众也没有说什么，表面显得很平静，我知道那是避免人群混乱失控的一种妙招。我感到情况不妙，便没有去亲属家里，立刻步行到聂塘，很晚才抵达那里。几天过后，抓捕我的人又到了，他们把我带到拉萨看守所。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5. 入狱后的感受和得失

提问：老师您入狱有什么感受？

答复：入狱后认为比较有利的方面是，桑娅监狱地处寸草不生，狂风四起，尘土飞扬的荒凉地。从它的外表景象就让人感到心寒。进入监墙内发现有两排房子，劳改第四、第五队都住在帐篷里。每个囚犯面前只有一只铁碗之外，其他什么物品都没有。那两排房子墙面上各写有“第一队”、“第二队”的字样。

监狱里看到带着手铐脚镣的囚犯走过时发出“叮当”声，顶部加装刀片刺绳围起来的监墙门旁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哨兵，上厕所也要喊“报告”请求。看到这些情景让人自然生起忧愁和恐怖感。我进监狱时狱警前来查身，并检查了我的被褥，最后，被安排在第二队，除了被褥什么都不让带。监狱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本人曾多次悲伤地流出了眼泪。

后来新建了四栋房子，分别分成一队、二队、四队、五队。同时其他设备也有所改进了。当我带进狱警办公室查身时，看到墙壁上挂着的刑具，如：手铐、脚镣，还有自动手铐和脚镣，以及电棒、指夹、警绳等，感到不寒而栗，晚上想起这些甚至无法入眠。

另外，当看见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通称扎基监狱）那扇朝东的黑色大门时，使人不由地打寒颤。其监墙高达五公尺，顶部还加装两道刀片刺绳。现代设备监视器、摄像头等无处不有。那里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恐怖气氛时时刻刻伴随着那里的人，患精神病是家常便饭。比如：热根瓦的儿子龚布索南因上述原因得了精神病，最后脑溢血死亡。

6. 在监狱中受审情况

在监狱中对囚犯进行审讯的时间一般是刚进监狱时，以及在所谓冬季学习的年度总结期间。冬季一个月不需要参加劳动，但都需要参加学习班。刚进监狱后狱警会用温和的方式进行审讯囚犯，让囚犯老实认罪。也用责骂、毒打等残暴手段让囚犯招供。本人亲眼所见的有，雪康之子雪楚和郭邦侄子强巴索巴二位都是年轻人，狱警对他们进行责骂，毒打，还让囚犯打囚犯，以及对强巴索巴带着手铐脚镣与其他囚犯参加劳动，因而这位年轻人得了精神病，目前，人还在拉萨。

1995年冬季学习一直进行到下一年二月份，当时，上面让每个囚犯要写出承诺：“我们将会远离达赖集团。通过这次学习，我们明确认识到，西藏不能获得独立，也无法独立。”我们却同心协力，一统给上面写到：“我们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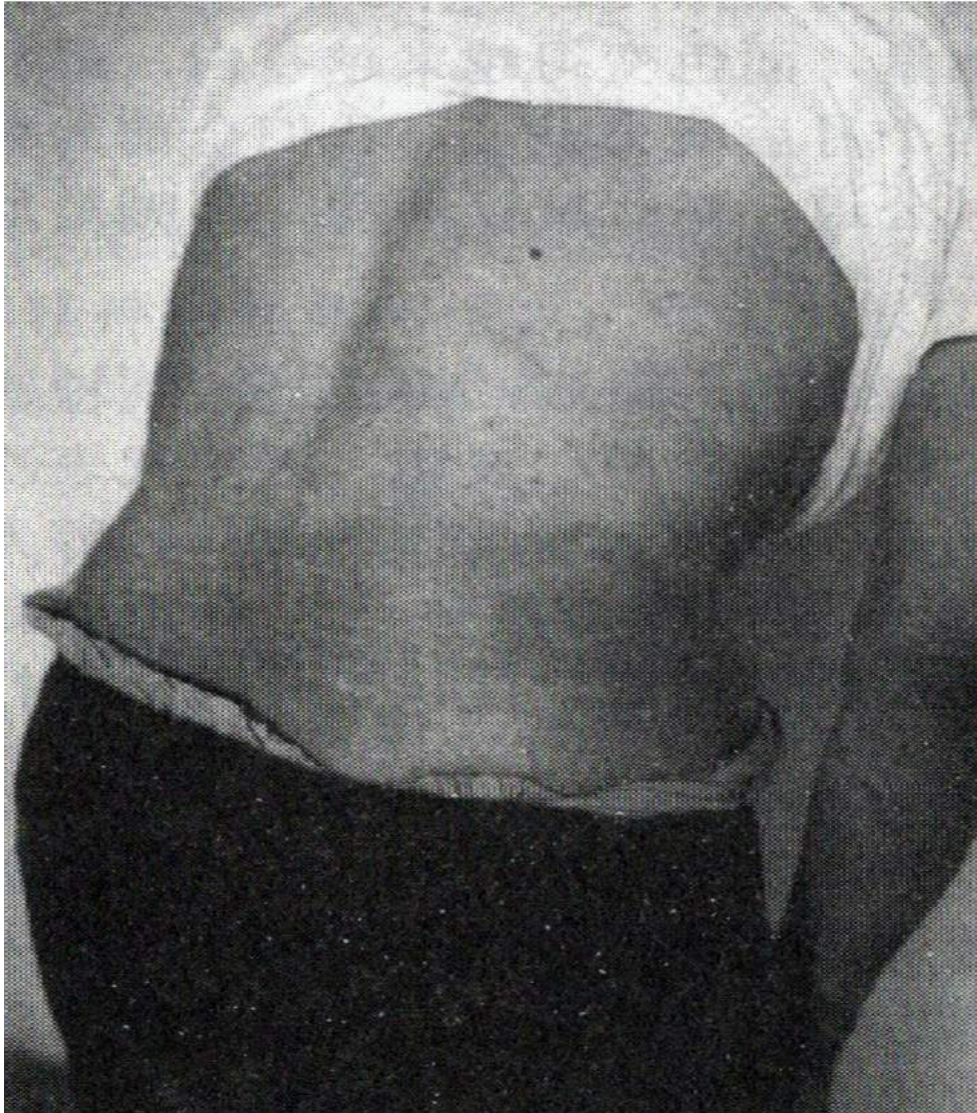
后来，我的狱友康美寺院僧侣桑杰丹巴写出上述的“承诺”去上交时，狱警尼玛（绰号叫“电子表”）和边巴中队长二人用关有细沙的胶皮管轮流殴打桑杰丹巴的头部，不省人事的桑杰丹巴被拖到队里就扔下了。后来他慢慢减少饭量，面色变得越来越苍白，最后送到医院住院三四月后就去世了。我们都为失去生命的桑杰丹巴讨公道，举行抗议活动，高喊是尼玛和边巴中队长打死了桑杰丹巴。

当局不承认是殴打致死，最后，决定医院检查尸体。其家属方面由参楚仁波切父亲，囚犯代表是次仁彭措，还有狱警代表，以及送尸体的叫道丹的人等参加。医院查出：死者脑髓已变成水状，且看不到脑脉，其形成原因是脑部震荡造成。便认定死者是因殴打致死。

冬季学习时，对一位称陈来嘉措的第一队囚犯进行殴打。陈来的两手捆绑背部吊在屋架上，脚尖离开地面，就这样很长时间吊在空中，导致大便失禁。最后，看见陈来嘉措还是被枪决了。

我的熟人孜仲在囚犯关押的房间内遭到狱警和囚犯联合毒打，听到用鞋底打他脸部的‘噼啪’声不断，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时，脸部肿得几乎认不出人来，两眼都睁不开。

至于对本人也在审讯和冬季学习期间受到过无数次的严厉责骂。平常对我的殴打方式是，左右各站里一名狱警，他们轮流用腰带打我的腰和股部中间，一直打到昏倒在地。有一次，医生和护士在治疗我腰间那些皮肉裂开的伤口时，感到很震惊。如今，腰间的那些伤痕还清晰可见。现在这些已变成无法医治的痼疾，两腿无法正常活动。



达那·晋美桑布在狱中受折磨时留下的伤痕

后来，在审讯期间本人因没有揭发其他人员，便对我用了一种特别刑具。据说，那刑具是日本侵华时用的手铐。两只手臂套在铁环中，然后连接两个环的铁链环绕颈部交叉在肩关节后面。拉动铁链时肩胛骨痛得要命，两手无法撑住饭碗。



对晋美桑布使用的特殊刑具图片 1-2

有时，手铐铐得太紧对小臂留下伤口，左手肿胀时痛得日夜难熬而不断发出号叫，小臂上留下的压缩手铐痕迹现在仍然清晰可见。戴着手铐脚镣从桑娅监狱带到扎基监狱，参加囚犯大会，当时本人受到的这些虐待行径上千囚犯都看到了，在桑娅和扎基监狱呆过的老政治犯们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目前在印度的原政治犯贝丹嘉措等也一定看到当时我的遭遇。所受到的折磨难以言尽，玩弄式的折磨还有，对囚犯头上套塑料袋，弄得难于呼吸而惊恐万分；夏天囚犯身上泼热水；冬天身上却泼冰水；还用电棒戳男女囚犯生殖器等，完全没有人道主义概念。

在文革期间，中共的“七大大人物”受折磨致死了，其中著名的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藏区受迫害的有张经武夫妻、谭冠三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6. 在监狱中开展绝食活动

提问：听说老师在狱中还展开过绝食活动，请简要地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答复：我在狱中搞过一次绝食活动。有关这事宜刊登在《西藏时报》2007年8月10日，第385期。此事是报道彭措旺杰先生在狱中绝食情况时插述的。当时我的情况也这样描述：“西藏达那·晋美桑布等原政治犯曾在扎基监狱举行绝食活动，这些我们应该要得到了解……”

由于这则新闻，我不得不回顾那段经历。那次的绝食活动是，1987年8月份，我的住所被安排炊事班，平常炊事员都要早些起床，到伙房去烧茶煮饭。某一早晨，我想他们就要起床了，这样，我自己也睡不着，便端坐在床上消磨时间。不一会儿，一名狱警开门进来发现我端坐在那里，便问我：“你为什么坐在那里？”我对他说，他们起床出门后，我也睡不着，就这样坐在床上。“你胡说，这明明是搞迷信活动……”那狱警对我责骂一顿后出去了。

早饭后，狱警又对我说：“你在那里念经搞迷信活动。要老实承认，到底念了什么经？”（狱警担心的是，藏人囚犯念诵尊者达赖喇嘛长寿经。译者注）当时，我便问他，囚犯睡觉醒来的权利都没有吗？他们起床时我也醒来了，继续躺着背部痛，有时我到院子里散步，当时狱警看到我也没说什么呀。所谓共产党平常也不是讲“人权”吗？现在，为什么对我却睡觉和醒来的权力都没有？本来，所谓这个共产党，大家都认为要驱逐西藏，我看，还是有必要。就这样，大声跟他们吵。

正在这样吵闹时，监狱负责人郅剑科（译音），他的真名不太清楚，平时我们对他叫“台西”（“台西”是藏语，意思是厨房抹布。平常此人穿一身难看的衣服，因此，囚犯给他起名叫“台西”）“台西”前来对我说：“你在胡闹，作为囚犯不应该这样，你要讲出原因来。”我当场给他重复了上述我讲过的那些话。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要造反了，我看，你不要住在炊事班。”说着便离开了。

中午还没有开饭，“台西”带着一名狱警又来找我算账。他们让我爬在床上，然后开始毒打，口中还不停地说：“你有本事就使出来吧……”最后，“台西”下令：“停止修理！把他关进禁闭室。”当时，还没有专用禁闭室，门卫值班室旁边有一间小房子，我被关进那间房子后，派了两名狱警，一名称索南旺堆，另一名称次旦多吉。对狱警道：“他在上厕所时，或者在监狱里会胡闹，还会搞迷信活动，你们要严厉看守他。”我对他们说，这样还不如死，我要绝食抗议。

从8月7日，我开始搞绝食抗议活动，每天不吃饭只睡觉。当时，我的决定是死也要绝食十天，试试看十天不吃饭会不会饿死，这十天，即不吃饭，也不喝一滴水。可是，有一天，两个看守我的狱警不忍心我这样饿死，便拿出一瓶水果罐头，次旦多吉死死抓住我的手，索南旺堆用一只手夹住我的面颊，另一只手向我的口中灌果汁。果汁一到口中我就用咽喉里的气“呵”的一声退出来了。那天，就这么折腾一滴果汁有可能灌到肚里去了，除了这一滴之外，十天什么也没吃没喝。绝食期间管教干部前来劝说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便开始责骂我。我一句话也没说，躺在那里没在乎他。最后，他对我说：“你这样饿死，活该！我们不管你了。”说着走出去了。

一会儿，他带着两个女医生又来了，那两个医生把塑料管子插在我的鼻孔内，试图灌稀粥。但那管子不够长，没有到达食管内，我又用咽喉里的气推出来了。两名女医生顿时手忙脚乱，两手还不停地发抖。

当时，那位科长对我说：“你真的需要这样做吗？你还是这样，死了活该。好，别管他，这样的坏蛋死一两个，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时候，上厕所就要人背着，否则没有办法动。因没吃没喝，小便只有一两滴。就这样，十天过去了，人还是没有死。

从前，我在桑娅监狱时，有一位汉族囚犯对我说过，绝食时一滴水也不能喝，这样，就不会有饿的感觉，一旦喝了水就要撒尿，同时就感到饥饿难忍。这次我亲身经历，那位汉族囚犯说的没错，不喝水就感到不饿，但口渴得难忍。到十天后，我就对那两位看守说，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吃饭了。那时，监狱里有一位称康巴总统的藏人囚犯（此人因鼻子大，象美国总统，大家就称他“康巴总统”），他平常都来照顾我。我在绝食期间，他每天都到我那里忐忑不安地问两个看守，“他是不是死了？”康巴总统的老家是康区，离我们那儿路程太远，家人每年只能一次来看望他。他的家人每次都带很多干肉、干酪、糌粑、酥油等。我通过两个狱警跟他要了点糌粑吃。他给了好多糌粑、酥油、干肉等。中午监狱对囚犯供清茶，我在清茶内加酥油后，做成酥油茶喝。康巴总统捎话给狱警，不要吃太多，吃多了有危险。

2001年某一天，监狱管教让我们去看电视新闻，我对管教说，我不喜欢看电视，平时也不看，看电视头痛。他们却不管这些，抓住我的手臂拉走了。到了娱乐室我还是没有看，躺下来休息。管教又对我说：“美帝国主义受损失，你在这里致哀是不是？”并下令今天必须要看电视。所谓新闻是有关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一事。我对他们说，我看不到，电视里的画面我看不清楚，说着还是躺在那里没动。管教让其他囚犯扶我起来看电视，并对我说：“看看！分裂主义的靠山老美怎么啦？现在看看他们……”

后来，我又在一两天内没吃饭，当时也生了病。监狱医生检查完后，说要送到武警医院去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这样，我便送到色拉附近的武警医院。那是一所规模大设备良好的医院。医生从我的鼻孔插输管到胃部，对我输了高营养药物和面粥。顿时胃里面是热乎乎的感觉，那里医生都是军人，态度也很不错。当输管拔出时好像五脏六腑都掏出来一样难忍。第二天，医生问我：“以后吃不吃饭？”我回答，吃。当时我认为，他们不让我死，这样做也是自己折磨自己。事实上，如果这些人对他人关心一点就好，但对有些人却没有得到关心而死了。

8. 监狱里的状况和生活感受

提问：以上老师在狱中的遭遇已讲述完了，下面要请教的问题是，我想在狱中饿死，冬夏衣服不够用等问题在所难免，这方面，老师有哪些亲身经历？

答复：于1959年之前，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上千名囚犯关押情况，更不用说妥善管理囚犯的经验。中共也同样没有经验和能力管理如此之多的囚犯，这正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从而导致成千上万的囚犯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另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在其政治和经济方面与苏共闹矛盾，更是雪上加霜。不用说那些囚犯，甚至无能解决自己民众的衣食住行问题。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切要听从几个党的领导人指挥，出现失误和严重恶果在所难免。本人于1965年至1968年间，在桑娅监狱时，每天早上是清茶和糌粑，中午是两个馒头加水煮的蔬菜，晚上又是清茶加糌粑。夏天穿的只是单衣单裤，冬天每三年间发一件棉衣棉裤，里面没有任何内衣。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每天还要按计划完成出工任务，许多年老的囚犯因体力不支死亡。比如：在我旁边一位称阿波尊追的五十六岁老人晚上上厕所回来后，躺在床上出了几声粗气后再也说不出口了。我赶忙叫班长去报告狱警和我们班的相关人员，却没人理睬。去报告其

他班，因是深夜也没有人前来过问。第二天早晨送往医院时，人已成半死不活，几天后阿波尊追就死了。当时生活那么艰苦，再加强迫参加劳动导致这样的结果。

至于我本人因条件艰苦，还要参加繁重体力劳动，早上发下来的糌粑早已吃光了，到晚上只剩下水煮的蔬菜，因而闷闷不乐绷着脸时，我们的班长洛追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把自己的糌粑袋子扔到我面前说：“晋桑！吃糌粑。”使我感到很感动。生活非常艰苦，连喝点开水都很难办到，服药用的开水要到伙房去要。一年冬夏各发一双鞋，鞋底磨烂了到外面垃圾堆里找旧军鞋，然后两个鞋底重叠起来穿。

过去囚犯的生活极端艰苦，现在讲这些经历别人很难相信，被认为是吹牛。这也很难怪，现在物质进步了。后来，于1973年，总理周恩来下令，文革期间全国各大监狱中虐待囚犯很严重。从现在开始不能虐待囚犯，并指出，监狱主管对过去的错误行为要赔礼道歉。

从此，监狱对囚犯每月发五元的零用钱，作为购买牙膏香皂之类的日用品。还开始对囚犯供给大米、面粉、清油等，使生活有了极大改善。1976年，毛死后邓小平逐步掌权，中国开始搞“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同时，监狱里囚犯的衣食住行各方面也在不断提高，现在的囚犯们已经完全脱离了饿死的危机，每顿饭都可以带到各自住所吃，且不限吃量吃饱为止。在穿衣方面，监狱每年都发放囚衣，另外还允许接受家属带来的衣服。新到来的囚犯们看不到老囚犯所讲故事里的那些事物，认为那是以党中央为主的各省、自治区，以及县级部门的政策在逐步发生变化的结果。正是所谓的“诸行无常”啊！

如今，对囚犯的管理方面却比从前更严酷，使用现代化监控设备，囚犯根本没有活动空间。比如：看看拉萨市的管理方式，大家便清楚，监狱里的状况便可想而知。正是所谓：“瞎子也能摸得出”，尽人皆知，不需再赘述了。

9. 监狱里遭受什么样的虐待

提问：老师您个人在狱中遭受了什么样的特别虐待？

答复：我在狱中遭到特别虐待方面，如同上述，整个囚犯在遭受虐待的同时，尤其本人遭受额外虐待，这里有必要作补充。对囚犯人道主义管理，共产党为了对外界宣扬这些，曾发表了一本白皮书，从中宣扬囚犯享受宗教信仰自由；享受文化娱乐自由；享受医疗保健，等等。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践，1973年，本人因白内障两眼逐步失明，倒茶水时还需要在碗里插手指来掌握，否则眼睛无法看清楚。本人住所的门上挂条白布，要不就很难找到自己住所的门。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同其他囚犯一起参加繁重的劳动，如：搬石头，背泥浆等。完全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监狱里的那些管教人员根本不知道白皮书内容。当时，我去找阿旺政委请求，我得了白内障，红色的东西和路面都看不清，请不要安排我出工。几天过后，阿旺政委对我说：“我去找了医生，还是没有办法。你的白内障还不到动手术阶段。你可以去做翻晒土胚的工作。”

后来，我出工时因无法看清路面而摔倒了，当时囚犯们排着队正好走过来了，看到这一情景大家都很紧张。最后班长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狱警，这样，从第二天起就不需要参加劳动了。

可是，一直对我的白内障却没有动手术，直到 1980 年服刑期满后，我被安排在聂塘砖瓦厂工作。1981 年年底，在亲属贡桑和妹妹贝曲的帮助下，对我的左眼做了一次简单的手术，右眼还不到动手术期。1983 年，再次被捕入狱后，一直到 2002 年在监狱里，对我的右眼却没有动手术，这就证明监狱里没有人道。所谓白皮书也是欺骗世界人民的一种工具，是空洞的使人恶心的宣传品。

1 0 . 在扎基监狱中囚犯开展抗议活动

提问：据说，1998 年，扎基监狱内囚犯展开抗议活动，警方在镇压囚犯时发生死伤事件，这一事件对社会震动很大。因此，请老师谈谈您对此事的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

答复：当时我的听闻是，据说这所监狱要打造成全国第一流的现代化监狱，首先，建立爱国模范监狱。在监狱广场上举行升国旗活动，让囚犯在唱国歌时，不能喧哗，挺直站立，强调良好的外表形象。

五月一日这一天，监狱召集所有刑事犯，并从第八队政治犯中抽出 60 名，一同举行升旗仪式。正在这时，囚犯噶玛达瓦和噶玛索南二人，手持横幅标语跑到讲台喊口号，狱警马上一拥而上开始对他们进行殴打。其他囚犯看到这种情景后，一同喊口号。开始展开抗议活动。

当时，狱警和其他部队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所有囚犯，尤其对第三队女性囚犯镇压更突出，狱警把尼姑打倒在地，然后抓住头发在地面上拖拉；还用拳头猛击乳房而昏迷倒地，等。顿时哭声、叫喊声、怒喝声连成一片，这些在本人住所都能听得清楚。其间藏人狱警和汉人狱警之间也产生民族矛盾，别说建立模范监狱，反而出现了重大问题。

后来，于五月四日，再次举行了升旗仪式。下午四点左右，第八队囚犯康美寺僧侣洛桑曲培自告奋勇地举行抗议活动，最后还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杀了。囚犯坚参曲培为主的几个人抬着死者的尸体到队长那里评理时，二话不说，就此毒打一顿。这又导致第八队所有政治犯揭竿而起，紧接着第九队政治犯们也群体起哄上阵，狱警慌忙向人群开枪，哲蚌寺僧人阿旺松热中弹倒地；澎波新寺僧人阿旺多吉头部中弹，送往医院时头顶如同婴儿脑凶门，突突跳动着。此时，我们都返回广场坐下来了，我起身准备讲述理由时，监狱长刘宝坚（音译）对著我的胸部打了一拳，我几乎跌倒在地。这时，噶蔡寺僧人索南次仁对监狱长说：“不要殴打老人，你想打人就打我吧。”说着站起身来，同时，澎波林堂寺僧人达瓦随手抓起一把沙石投向监狱长。众人又要起哄时，狱警巴桑扁头等猛扑向噶丹寺次仁彭措，达瓦等僧人，一边毒打一边把他们拖到外面，让其他囚犯都回到各自住所。

当天晚上，狱警边巴中队长（绰号叫“木亚包罗”）等前来查看各房间时再次殴打囚犯。查看到我的住所时，殴打哲蚌寺阿旺普雄和甲玛图丹益西后，又把他们拖到外面去了。中队长边巴对我说：“若你不老实，我就毙了你。”说着用手枪枪口猛敲我的额头，额头流了好多血。

第二天（5 月 5 日）开始，住所房间全被关门后进行严格管控，然后，又逐一对囚犯开始严厉审讯。我所在的第九队中，次仁彭措和彭措旺秋是第一个受审讯的囚犯，再下来是噶丹寺洛桑旺秋和克珠。这两位僧人在受审时被毒打致死了。那次，受严重殴打的囚犯是曲水觉丹。觉丹关押紧闭室时亲眼看见，噶丹寺洛桑旺秋和克珠半死不活被拖进紧闭室门口，医生吴锦（译音）看到那两个囚犯便急忙说：“哎呀！完了完了。”然后，两具尸体便拖到外面去了。

发生此事的原因可能是，1997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青年会举行绝食抗议活动。为了表达境内外藏人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便发生了这次狱中抗议事件。最了解此事的人也许是第九队已故囚犯次仁彭措和彭措旺秋二人。看来，监狱管教人员也有这样的怀疑。

第五部分：有关出生地和父母的情况

(1) 出生地和父母亲的种姓血统

提问：请老师介绍一下您的出生地和父母情况。

答复：我看，首先还是介绍家族的名称来历比较好。家族名称“达那”或“达那谿钦”。据老人所言，我家谿卡（庄园）前有一坐山，那座山山顶有一块巨石形同老虎鼻子，因而称“达那”（“达那”为藏语，意思是老虎鼻子。译者注）。

另外，本人在西藏一本历史书中看到，所谓“达那”在公元 820 年左右，藏王赤热巴巾有一位大臣称贝·达那。有一次，藏王饮青稞酒醉倒后，其大臣贝·达那和焦若拉隆一同掐死了藏王赤热巴巾。虽然，藏王精通政教之理，但在奸臣欺骗下，饮酒过患断性命。发现有这样的记载。那本书是 1982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行。其作者是色拉美邦拉格西耶西旺秋，拉萨出版社出版。

另外，还有一段达那·南巴的历史，对此本人不甚了解。之后，在原西藏政府，以及在噶丹波章政府统治西藏期间，达那家族在前后一百多内始终担任雪仲（原西藏政府时期，摄政、司伦、噶伦等的随从俗官。译者注）职务。我的爷爷达那曾是噶仲（原西藏政府噶厦秘书。译者注），达那之子达那·南捷顿珠，别名南捷次旺是我的叔叔。他生于 1881 年，于 1907 年加入藏政府公务员，后来担任藏军“甲”营代本，在平息波密地区动乱中为国捐躯。

达那·雄巴索南次旺生于 1892 年，于 1910 年担任藏政府雪仲。后来又担任贡嘎宗宗本（县长）及桑那曲宗，今察隅宗宗本，后来便去世了。他便是本人父亲。叔叔扎西次仁曾担任白朗宗及贡布宗宗本。1959 年，中共被捕后在狱中去世了。我的胞兄称晋美·司觉多吉，参加藏政府公务员后，担任堆雪庄园头人，后来在扎秦宗担任宗本时去世了。还有一位称拉旺次仁的叔叔，他被招婿到曲水卫堆家族，在那里寿终正寝。

我母亲家族称“阿沛·曲木谷”，曾是阿沛府邸历任管家。在我的记忆中大舅多吉次旺之子贝玛次旺都担任阿沛府邸管家。至于此事，目前还健在的阿沛之长子也会记得这些。我的母亲噶玛曲珍年仅十五、六岁时，便嫁给了达那，先后共生子女十六个，我是幼子。母亲去世时享年七十六岁。

我的出生地是曲水达噶尔庄园，于公元 1927 年 9 月份，即藏历己巳年 7 月初生。达噶尔庄园位于贾桑曲布日山前。曲布日山是十六罗汉之一的跋陀罗尊者所在地。赞普郎达摩灭佛时四位藏巴学者在此山修行。当时，一些身着僧装的人手持弓箭打猎。急忙前去探究，得知佛陀

教法正面临劫难，便停止修行逃亡多麦地区。不久他们有幸拜见贡巴饶色大喇嘛，西藏历史上其所传戒律，称为下路弘传。

达噶尔庄园所在地是拉萨河和藏布河汇合处，雅鲁藏布江的发源地在该地东部，现在这一带称达噶尔乡。从那里由西向东奔流的藏布江是圣地岗底斯山四方的四大河流，即：东部马泉河；南部孔雀河；西部象泉河；北部狮泉河。东部马泉河亦称雅鲁藏布江，其上游称拉萨河，东部拉萨河和西部藏布河在贾桑曲布日山东部流向森布日以西的突出地汇合成雅鲁藏布江。

（2）人生中有关对宗教的看法

提问：老师，在您的人生中对宗教有何看法？

答复：我的母亲养育了十二个儿女，可是，大部分幼年夭折，剩下的不多。因为我在其中排行最小，母亲曾带着我一同前去参加两位经师（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林仁波切和赤江仁波切。译者注）主持的法会。小时候，还记得在后藏岗坚喇嘛、直隆格西仁波切、拉萨格西桑珠仁波切老少两位、贾桑珠陀仁波切等处曾接受传法，并前去卜卦。其中直隆格西仁波切和岗坚仁波切等神通广大，算卦很准。

特别是我的姐姐次旦卓玛和哥哥晋美都英年早逝，上述高僧大德们都认为是注定的劫难，对此深信不疑。本人在十八岁那年因热病差点丢了命，当时便到赤江仁波切处接受加持，那天，仁波切正好外出前往警卫团传授教法去了。一直等到黄昏还没有回来，诺布林卡府邸门即将要关了，只好返回，从正门出来走了一段路，幸好，后面一位膳食堪布传话，仁波切说让病人带进来。见到赤江仁波切后，仁波切便开始对病人进行禳解病魔，还给病人戴上经过加持的结绳，并吩咐回去后需要进行驱魔仪式。当天晚上，本人梦境中好像有许多人从屋里跑出去了。据母亲说，当时我还说梦话：“不要跑了……”

后来，有一次，我眼前一黑就昏迷过去了，之后又逐渐出现如同黎明时的曙光，感觉像朗朗虚空，难于言状。有一次，我母亲也遇到类似情况。此时脑海中时时出现，第七世达赖喇嘛的断行法中的这段偈陀：

观彼身心皆不成为害

观此损害彩绳见为蛇

唯缘起实词信以为真

愿自心错觉将得了断

一想到这首偈陀，沉重的心情顿时会变得轻松许多。

在狱中，以及平时面临困境时也会带来很大帮助，能够自己对自己开辟宽广心境。认为所有这些便是虔诚信仰佛教，积极参加法会得到的利益。《八千颂》中：“心性为鲜净光”之说。

诸多上师喇嘛及修行者经过修行，最后圆寂时盘膝端坐坐化。比如；1980年代，我在狱中看到宁玛派珠古顿珠仁波切一篇文章，他是拉萨宗教局工作人员。文章中写得到：“察雅县有一位称热赤喇嘛的人，生有一女，那少女在去世前对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留下遗言，便以坐化离世，而且在十来天之内其遗体变得愈来愈小，最后成一肘那么高。如同证得五蕴成光明身像果位。那时候，可惜西藏没有相机，要不便成为人人可目睹的实例。”

经师林仁波切圆寂后处于盘膝端坐状态达十三日；第一百任噶丹赤巴洛桑尼玛圆寂后坐化，也处于盘膝端坐状态达二二日之说，这是一种最接近佛的状态，实在太奇妙了。另外，一位曾居住在马尔康的瑜伽大师龚布仁波切，在文革期间被捕后判刑十年。这位大师曾在昌都监狱和桑娅监狱时本人拜见过他，后来，于1994年，瑜伽师龚布仁波切在拉萨小昭寺附近的气象站，其妹妹宿舍内圆寂后，处于盘膝端坐状态达数日之说。

本人在瑞士西藏文化中心时，于2009年见到称阿旺扎巴的一位马尔康年轻人，他也对我说：“1994年瑜伽大师龚布仁波切坐化圆寂，我专门前去参拜了他，并亲眼看到大师的遗体显得非常小。”当时，我便对他说，我也听说过此事，你有幸能亲自拜见大师遗体，这实在难能可贵。以后，我将要写我的简历时，你讲的这些事，甚至你的姓名都写进去的，我希望得到你的许可。他说：“当然可以，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很高兴，并表示感谢。

第六部分:对有关藏人行政中央的看法

(1) 对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贯看法

提问：您对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贯看法如何？

答复：我对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贯看法是，首先，藏政府是一个自由的宗教组织。由于中共军队以解放为借口侵占西藏后，以尊者达赖喇嘛为主的西藏政府官员，以及多康卫藏三区近万名藏人流亡于他乡。相应印度政府对尊者达赖喇嘛为首的全流亡藏人伸出援手，并按国际法规接受避难。在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尊者达赖喇嘛，以及印藏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开始建立流亡藏人定居地，以及为培养西藏下一代，在各地逐步建立了流亡藏人学校。如此，藏人组织从无到有，从有到更完善。各流亡藏人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使藏人行政中央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中共政府对此怨言不断，国际上藏人行政中央的声誉却自然地传播开来了。

有了这样的藏人行政中央，西藏人才有了功不可破的凝聚力，西藏宗教文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使西藏这个民族根深蒂固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另外，藏人行政中央还成为境内全藏人的希望之寄托处和榜样；是西藏优良的民族传统和与众不同的宗教文化等，已衰者令恢复，未衰者令增长的根据地。也是对西藏民族建立现代民主制的开山祖和奠基石。

在流亡藏人各校培养出来的人德才兼备，成为西藏社会顶梁柱。如；学者桑东仁波切，他是一位很受藏人和印度人尊敬，大公无私，胆识兼备，有勇知方。也不会矫饰精通，冒充行家。

另外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领导人，如；政府各部门主管，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尤其是司政和议会议长是通过民选脱颖而出的普通藏人子女，他们不仅对本民族，而且在海内外，以及是国际各界学者都受关注和尊重的领导人。总之，对藏人行政中央在“不对”、“不行”、“不好”等各种不同声音中，无论如何，还是成为上层官员之老资本，下层贫民之寄托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出气筒”，无疑流亡藏人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喜庆扎西德勒的旁边也离不开祸胎。任何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是规律。我们有这样的组织，而且以佛菩萨化身历代尊者达赖喇嘛的发心力，拥有如此优秀的领导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便是诸有情，特别是雪域西藏人的福气。

无神论中共官员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清，在这样的危机关头我们当初争取西藏独立，之后争取民族自决，其后又诉求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些都是明智之举。总之，我们在绝境中已经找到了出路。

境內藏人也在流離失所，水深火熱之中得到自救。從中羽翼丰满後飛到西方各國，能如虎添翼，那就更不用多言了。

我們的對手是強大且奸詐無比的中共，他們軟硬兼施，想盡一切辦法滅絕西藏民族。但結果反而使他們在其民眾面前處處碰壁，幾乎走到崩潰的邊緣，這是因果報應。相信西藏流亡組織不久將會獨立自主，民眾的願望一定會的到實現。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

（2）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嗎？

文/唐丹鴻

對大多中國人來說，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而西藏人則堅持，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前，西藏一直是獨立並與中國相互分離的。

人類世界的荒誕千奇百怪。在世界東方那片 900 多萬平方公里的紅色大國裏，向人們傳達的資訊是：關於西藏到底屬於誰，並不由自古生活在西藏土地上的藏人說了算；而是由 1949 年起掌握了中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說了算。

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在中國政府爲了應付西方世界的壓力，居高臨下與達賴喇嘛代表團的幾輪談判中，最重要的一項苛刻條件，就是要求西藏流亡政教領袖、至今最具公信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承認，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此，基於中間道路的理念，從 1979 年起不再提獨立，但求高度自治的達賴喇嘛無法接受，理由很簡單：“歷史就是歷史，無法改變。”作爲一個信守比丘戒律、不得妄語的僧人，他不能撒謊。

中國政府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多次在各種國際國內場合指責道：“第一條，他不承認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達賴喇嘛反復聲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的時候，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現在西藏仍然是一個被違法佔領的獨立國家。凡是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自元朝開始，中國中央政府就對西藏行使著無可爭辯的、有效的行政管轄。”

對犯下各種罪行無數的共產黨，中國人可說民怨沸騰；中國政府的宣傳在人們心目中成了謊言的代名詞。但關於“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大多數人倒是樂於接受，包括很多聲稱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士。就是說，在“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一“歷史常識”上，他們倒達成了一致。這真是一種有意思的、值得分析的心理。

既然說是“歷史常識”，就要看這“常識”是怎樣形成的，是誰告訴我們的。中國境內十多億人關於西藏的“歷史常識”，不外乎來自於學校教育和官方宣傳，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而教育和宣傳的話語權由中國共產黨政府全面控制，其目的是爲了維護和鞏固其獨裁統治，這已是我們的基本常識了。就是說，關於西藏的“歷史常識”都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告訴我們的。

問題是，這常識是否是世界公認的常識？是否存在西藏人自己的常識？我們知道藏人自己的常識是什麼嗎？中國人的常識和西藏人的常識，哪一種更成爲了世界公認的常識？是否存在既非中國官方、也非藏人的第三方，經堅實的學術研究後得出的結論？

實際上，常識也包含著簡單而無法推翻的邏輯。比如說：元朝是“中國”嗎？西藏與元朝的關係到底是西藏與蒙古的關係，還是與漢人中國的關係？清朝是中國嗎？達賴喇嘛與清帝的關係，是達賴喇嘛與漢人中國的關係嗎？“中國”、“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究竟是什麼概念？誰、何時定下的這個概念，得到了哪些人的認可？

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國際法和西藏學教授、華盛頓特區及倫敦的國際律師邁克爾·C·範沃爾特·範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的著作《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力與前景的分析》，作者對史料加以系統整理，依據可靠的文獻，對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進行了立論嚴謹、論據充分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與中國式“歷史常識”不同的歷史解讀。

這本書顯然不能進入中國境內具有“歷史常識”的大多數人們的視野。為什麼？中國政府擁有一大批歷史學家和西藏學專家，並佔有各種資料文獻的便利，難道不能嚴謹地從學術和法律的角度，對本書的觀點加以具有說服力的駁斥嗎？

（這篇文章寫得很不錯，便引載于此。）

（3） 最后对年轻人提出的要求

我想，对明慧有知识的年轻人不需要提出更多要求。未来的主人是你们，因此，你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并且还需要良好的心态和掌握丰富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还要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的体质更重要。常言道：“人没有知识如同没有灵魂一样。”学习的“敌人”是懒散和懈怠，当这两个“敌人”接近你的时候就要警觉。萨迦格言道：

智者学时皆艰苦

希求安逸难成才

应该要很好地理解它，并要不断做出努力。学习的科目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化，以及与时代能够并驾齐驱，流行及国际通用的言语英文。目前，西藏文化之精髓《甘珠尔》和《丹珠尔》都翻译成英文了，年轻人应该对这些方面引起重视。

尤其是老夫认为，思想道德教育是重中之重。要做到“智者不迷惑，圣者不秽行”，关键在于思想道德教育。有学问的智者却迷惑，比如：中学高中毕业了，却如同流浪狗满街跑，这样就不对了。

至于“圣者不秽行”是，若找到情侣，便如同毛驴找到萝卜洞，无法自拔，愿意放弃周围一切，对工作不起劲。这种人表面上伪装成圣者，实际上却不如一个普通人。先贤们对思想道德方面总结出这样的规范：“出家十善法”和“在家道德规范十六条”，这些是现代学者仍然受关注的蓝本。

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重要课题“秽”和“惑”的各种产物，对此不可忽视。2008年，西藏年轻人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发动那样的争取西藏自由运动，实在难能可贵，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一成果无疑来自于年轻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尤其中共政府也深深地了解到这一点了。之后，又改变争取自由的方式，以和平、正义、大无畏的精神，点燃自身。一个个年轻的勇士在滚滚烈火中，对世人留下了最后遗言。从那些遗言中又展示出现代西藏年轻人的觉悟水平。对此不需要我来解释，世界人民都很明了。因此，要更加重视年轻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未来的主人是你们，你们要从德、智、体全面得到发展。在体育教育方面要重视跑步、跳跃、举重、跳高等。身体得到锻炼，体内脉风自然会端直，同时能够提升智力，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祝愿年轻人身心健康，幸福愉快，奋勇向前！

为本族之洁白心怀

源自于自生之心田

为故乡雪域之臣民

自力所能及献侍奉

善哉！

(4) 鸣谢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以下几位亲属，及各位大德：

本人在工作队和服刑期间，姨母女儿仁增曲珍对我提供帮助，姨母临终时还留下良好祝福。侄儿多吉次旺和侄女贝玛曲尊二位三十多年来，每个月都带着衣服、食物、被褥，以及零用钱等到监狱探望我。出狱后又为我治疗眼疾，等等。对此本人双手合十于胸前，深深表示衷心感谢！

已故去的迪芒姐英忠，及其儿女等全家人表示谢意。在妹妹次仁贝姆夫妻的帮助下，释放后在美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季假日。抵达美国后，为期一个月住在妹妹格桑拉姆夫妻家里，并在各方面都得到她们的指导帮助，对此表示感谢。另外，还有卓噶女士、亚洲自由电台工作人员噶玛嘉措、卡多仁波切、桂蹊吉迪巴之子等对本人提供餐饭。以南卡夫妻为主的华盛顿藏人团体对本人进行了隆重的接送会，在此表示感谢。

抵达瑞士后，该地藏人团体负责人强巴和助理尼玛小姐为主的民众在曲阔寺院门前为我举行迎接会。热贡次仁彭措全家人邀请我到他们家做客。在住院期间，卸任议员次仁多吉夫妻，以及“西藏之子”组织前来看望我。尤其是嘉措夫妻、热贡次仁彭措夫妻、卸任议员次仁多吉夫妻、巴桑旺堆夫妻等常常前来对我问寒问暖，各方相助，深表谢意。

这些前来相助的人都表示：“我们理所当然要帮助你，这是我们的责任。”使我感到很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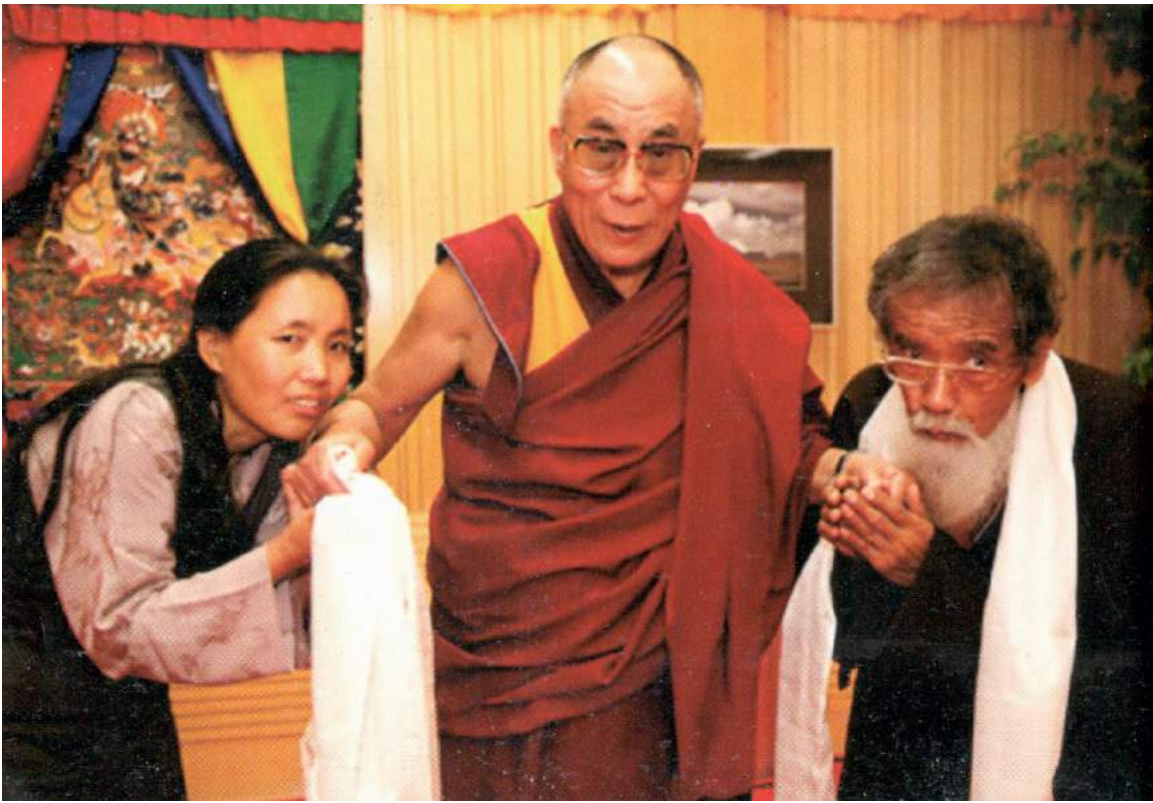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噶厦和西藏民众议会，邀请我列席议会会议。西藏流亡藏人接待处对我设宴，并带我朝拜达然萨拉附近的各寺院圣地。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对我举行宴会，会上赏赐礼物，并支付了我当时的所有开支。桑东仁波切执政时，噶厦对我举行宴会，并赠送了奖品，与各位噶伦和最高法院院长一起拍照留影。后来，又得到机会拜见司政洛桑森格，并同司政拍了留影照。对此由衷表示感谢。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9103组织主任巴桑次仁和副主任拉贾日·南捷卓噶，秘书眉吴贡坚，编辑拉恰金巴，以及再次定稿时，南捷寺法师图丹亚培，还有此书在撰写过程中的记录员，也是我的狱友阿波索巴等同仁，一同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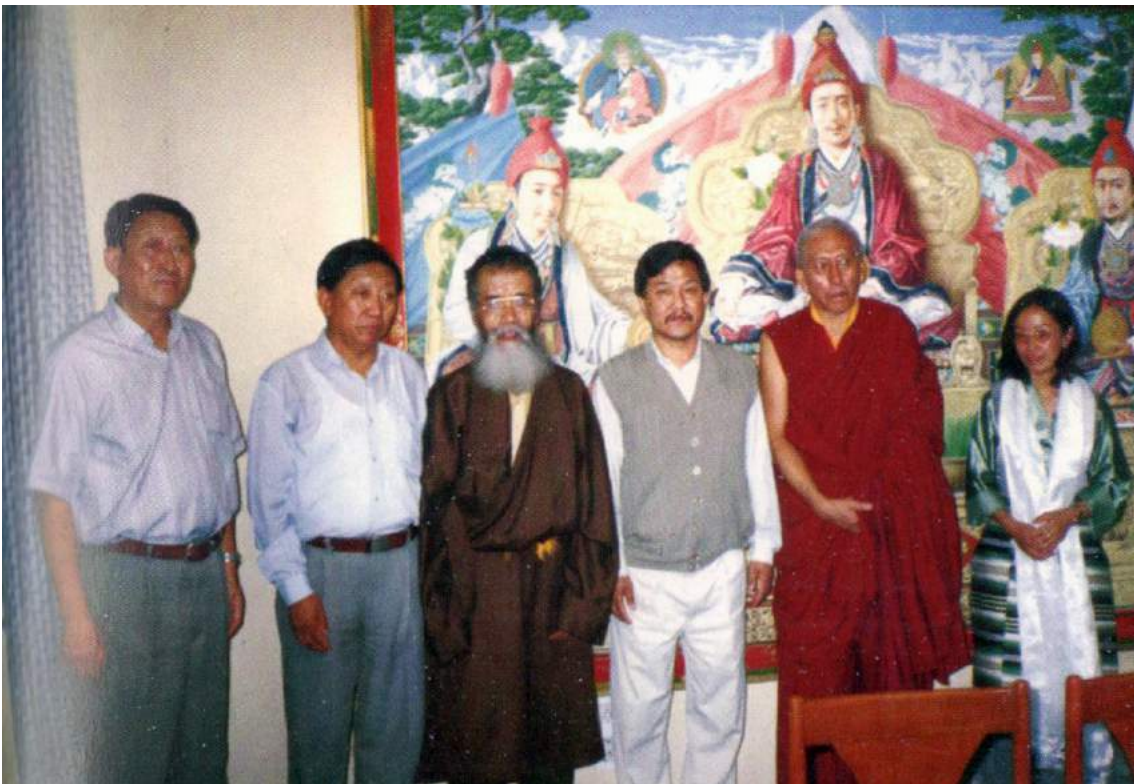
(5) 与人生经历相关的一些珍贵相片



达赖喇嘛尊者接见达那·晋美桑布



达赖喇嘛尊者接见达那·晋美桑布



藏人行政中央噶厦举行宴会时，与噶厦内阁留影



藏人行政中央噶厦举行宴会时，与噶厦内阁留影



会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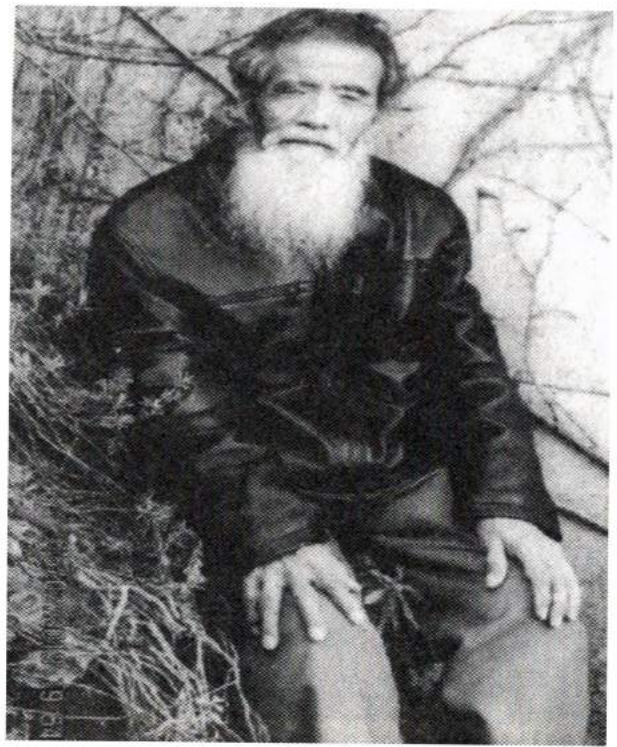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举行宴会时，与部长和部分官员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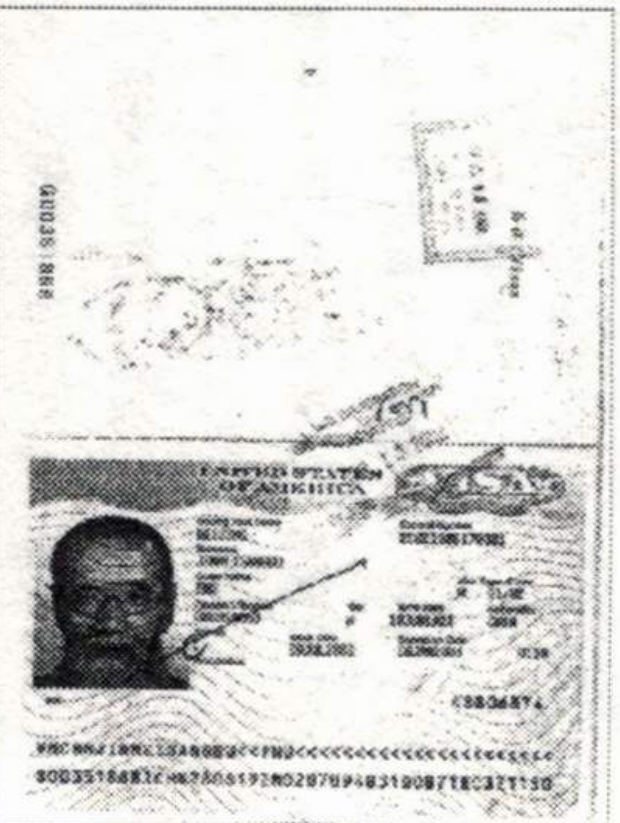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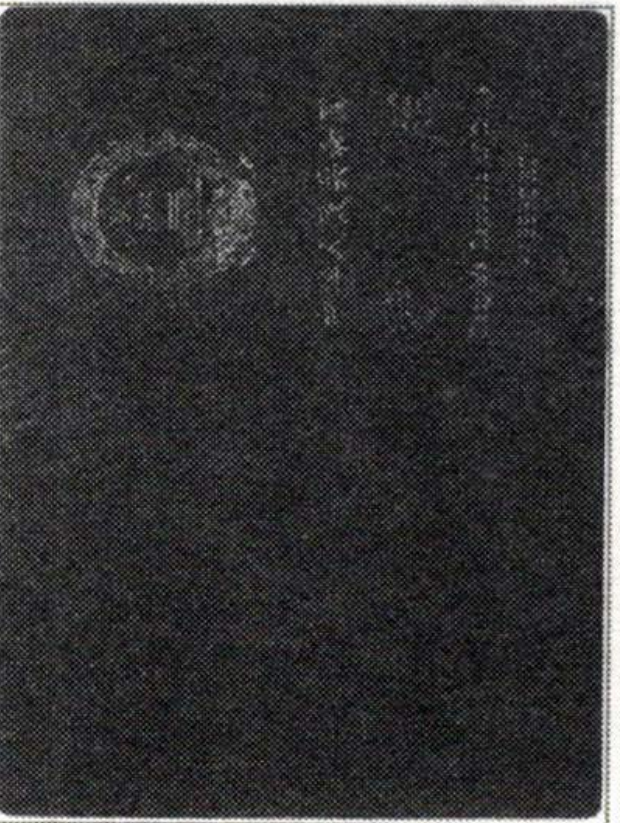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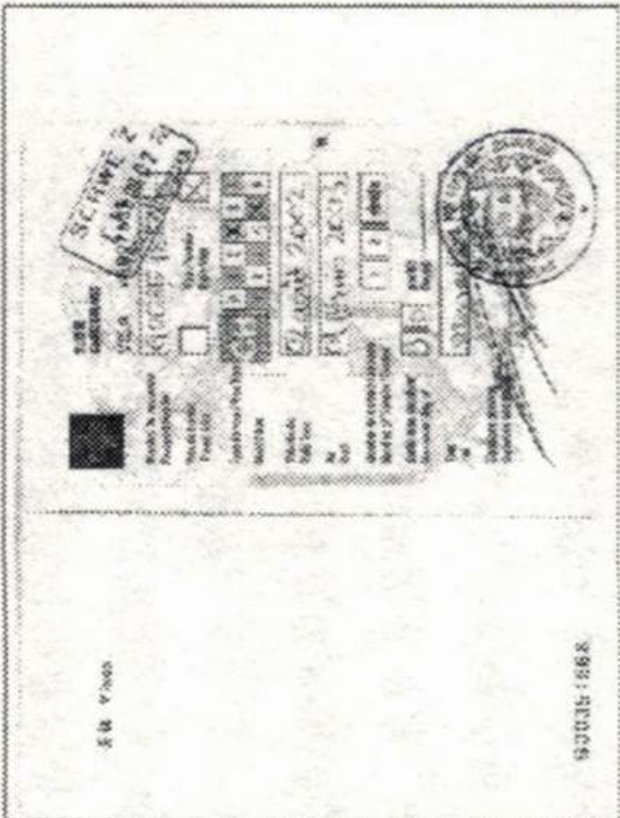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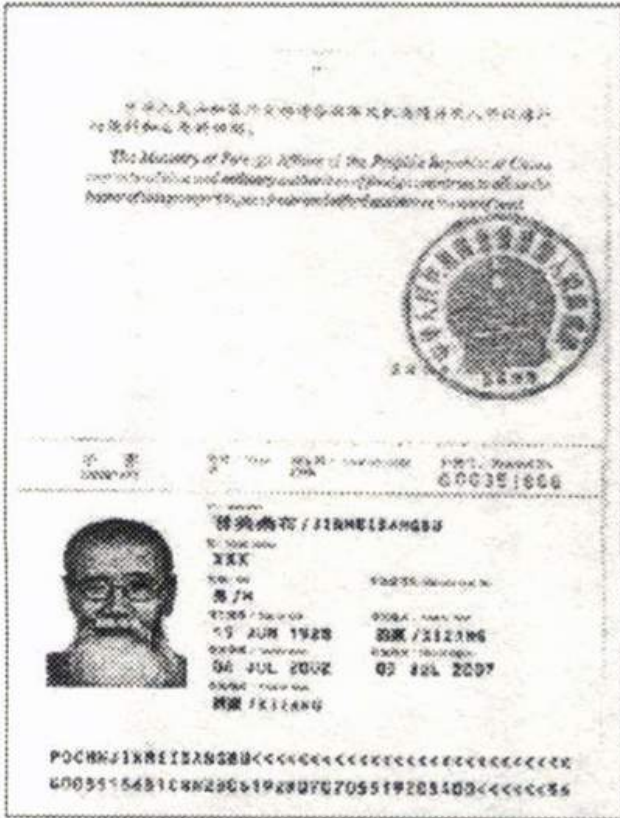
年轻时的达那·晋美桑布



壮年时的达那·晋美桑布



老年时的达那·晋美桑布



从扎基监狱释放后出国时的护照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拉法(1983)刑一字第 号

公诉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员普布。

被告人：晋美桑布，男，现年五十七岁，藏族，西藏曲水县人。一九七〇年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刑满后在劳改局第一支队砖瓦厂就业。因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三日被拉萨市公安局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晋美桑布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由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公诉人普布出庭支持公诉和被告人的自行辩护下，对此案公开进行了审理。庭审查明：

被告人晋美桑布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下午四时左右，公然在大召寺门口南侧墙上张贴由被告人书写的攻击我国领导，为一九五九年平叛鸣冤叫屈，叫嚣“要进行武装斗争”，“进行西藏独立”的反动传单。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被告人将写有“实现西藏民族自主自立，独立的战士”的白布条挂在胸前，并多次公开呼喊反动口号。此外，在我公安机关对被告住宅依法进行检查中，当场查获反动传单五份。被告归案后仍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公开呼喊反动口号，唱所谓的“战歌”并扬言要继续搞“西藏独立”等。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被告人晋美桑布，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刑满后不思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公然鼓吹西藏独立，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恶重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实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了

惩办一切反革命分子，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犯晋美桑布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至一九九八年九月三日止。判决执行前羁押期已折抵刑期。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自刑满之日起至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两份。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员：普达娃

代理审判员：阿旺索朗

“ ” “ ”：旦培平措

本件经核对与原本无异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马鹏夏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1988)拉法刑字第22号

公诉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员唐玉全。

被告人：晋美桑布、男、六十一岁、藏族，西藏曲水县人。一九八四年因犯反革命罪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1984)刑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现在西藏自治区监狱服刑。

被告人晋美桑布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由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拉萨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员唐玉全出庭支持公诉和被告人晋美桑布自行辩护下，对本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庭审查明：

一九八七年十月五日早晨，被告人晋美桑布乘犯人集中开饭之机，跑到中队大院内手拿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大声呼喊：“西藏独立”、“共产党欺负藏族”、“中国侵略军滚出去”等反动口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监管干部发现后带离现场。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书写的反动讲稿，证人证言在卷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亦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罪犯晋美桑布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服刑期间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与人民为敌，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且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为了强化人民民主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分裂祖国的犯罪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晋美桑布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加刑后的刑期至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自刑满之日起至二〇〇四年九月三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用书状或口头通过本院提出上诉或直接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强巴顿珠

代理审判员：晋美

代理审判员：德吉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旦巴

达那·晋美桑布判决书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1992)拉法刑字第011号

公诉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扎桑。

被告人 晋美桑布，男，六十四岁，藏族，西藏曲水县人，一九七〇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后在自治区第一劳改支队就业，一九八四年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一九八七年服刑期间又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现在自治区监狱服刑。

被告人晋美桑布犯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由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拉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扎桑、多吉出庭支持公诉和被告人的自行辩护下，对本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时许，人犯晋美桑布在监房内趁外国人参观监狱之机，用英、藏、汉三种语言呼喊“西藏独立”、“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等反动口号时被同监人制止。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在卷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亦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被告人晋美桑布以反革命为目的，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趁外国人参观监狱之机，呼喊“西藏独立”、“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等反动口号，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继续与人民为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罪恶严重、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实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应从重处罚，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晋美桑布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加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至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自刑满之日起到二〇〇七年九月三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用口头或书状通过本院提出上诉或直接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强巴欧康

审判员：李永庆

审判员：阿旺索朗

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

书记员：米 玛

达那·晋美桑布判决书

Ex-Political Prisoner Arrives in U.S.
AP[Sunday, July 14, 2002 00:00]



BEIJING, China - A Tibetan teacher believed to be China's longest-held political prisoner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Saturday, freed nine years early on medical grounds, a leading U.S. human rights activist said.

Tanak Jigme Sangpo, 74, arrived in Chicago from Beijing on Saturday afternoon in "pretty good health" despite serious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coronary disease, said John Kamm, president of the San Francisco-based Duihua Foundation. He said Jigme Sangpo was "frail but mentally sharp."

Kamm attributed the release to China's post-September 11 desire to bolster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I'm not at all convinced that the policy toward Tibet is changing. But I think they want to furthe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e this as a way of doing it," he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Calls to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weren't immediately answered Sunday morning.

By all accounts China's longest-serving political prisoner, Jigme Sangpo was arrested in September 1983 and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on charge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incitement and propaganda" for campaign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Tibet, according to Kamm.

His sentence was extended twice after that and had been due to expire on September 3, 2011, when he would be in his mid-80s. Prison authorities exempted him from physical labor several years ago because of his age, Kamm said.

In April, Jigme Sangpo was released from Lhasa's Drapchi Prison into the custody of his niece in Lhasa, a move initially believed to be a release. But Kamm said he was kept under house arrest.

Jigme Sangpo was also one of five prisoners cited by U.S. Ambassador Clark T. Randt during a Jan. 21 speech in Hong Kong.

The London-based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a monitoring group, said Jigme Sangpo was the sixth Tibetan prisoner released since January, including four "singing nuns," a group of women punished for recording pro-independence songs in prison. The most recent, Ngawang Choezom, was freed June 21.

"It seem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reassessing the necessity of continuing to hold people in prisons for long periods if they've been involved in peaceful forms of protest," said Kate Saunders, network spokeswoman.

Kamm, who met with Jigme Sangpo in Lhasa last month, said health may have been another factor in the release. "He needs medical treatment that they can't provide," Kamm said.

He said Jigme Sangpo was en route to Washington, where he will live with a relative and begin medical treatment. The Tibetan's plane ride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 "very emotional," Kamm said.

China removed all reference to counterrevolutionary crimes from its legal code in 1997 after repeated international complaints that the term was too vague. Today, the most common charge is subversion, which is used in similar cases.

Kamm said figures given to him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 there are 110 prisoners in Tibet serving sentences on charges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Kamm started the Duihua Foundation after unsuccessfully trying to persuade U.S. businesses to lobby China for prisoner releases.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release of several political prisoners. Duihua means "dialogue" in Mandarin Chinese.

卡姆的新闻报道

前政治犯抵达美国

AP[星期天，月14, 200200:00]

北京，中国一位藏族老师被认为是中国服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于上周六抵达美国。一家美国人权活动家说，因早期健康理由被释放。

达那·晋美桑布，74岁，从北京上周六下午起飞，周日抵达芝加哥，在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主席约翰·卡姆说，尽管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还是“相当健康”。他还说，“晋美桑布身体脆弱，但精神很饱满。”卡姆说：“释放归因9·11事件后，中国希望加强与华盛顿的关系。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并不认为对西藏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但我认为，他们希望进一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并认为这是做这件事的一种方式。”

呼吁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答星期天早晨的问题。根据卡姆，被公认为中国的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晋美桑布于1983年9月被捕，他是参加反对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而以“反革命煽动和宣传”的罪名判处15年徒刑。他判决后延长一倍，服刑满期是2011年9月3日，届时他将在80多岁才获释。卡姆在四月份说，晋美桑布是从拉萨扎基监狱释放，他在拉萨的侄女来抚养，此举最初被认为是释放，但那是监狱当局豁免，因为他的年龄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但卡姆说，他还是在软禁当中。

晋美桑布也是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香港1月21日讲话援引的五个囚犯之一。总部位于伦敦的西藏信息网

监控组说，晋美桑布是第六位自元月以来释放的西藏囚犯之一，这六位囚犯是包括四个“唱歌的尼姑”，她们在狱中唱西藏独立歌曲。最近，其中阿旺曲宗于6月21日被释放。

网络发言人凯特·桑德斯女士说：“如果他们已经参与了和平抗议，看来中国政府有必要重新评估，继续有人在监狱服刑很长时间。”

卡姆说：“上个月在拉萨见了晋美桑布时得知，健康可能是释放他的另一个因素。他需要医疗，但他们无法提供医疗”。

“晋美桑布在前往华盛顿途中，在那里他将生活在一位亲属家里，并开始接受治疗。”卡姆还说：“西藏人乘坐飞机到美国很兴奋。”

卡姆还说：“中国在1997年法律规定的所谓反革命罪这个词太模糊，被国际重复投诉而取消。今天，最常见的是国家颠覆罪，这也类似与‘反革命罪’。”

卡姆说：中国政府给他的数字说，有110名囚犯在西藏因“危害国家安全”服刑。卡姆开始为此对话未果后，试图说服美国企业，游说中国释放囚犯。他曾参与几个政治犯的释放。“Dialogue”中国普通话是“对话”的意思。

(卡姆的新闻报道译文)

Handwritten text in Burmese scrip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Five lines of handwritten signatures in Burmese script, including a large signature on the right side.

AUDIENCIA NACIONAL
Handwritten Burmese text below the title.

Handwritten Burmese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620104375
Handwritten Burmese text at the bottom right.

向西班牙法庭提起诉讼时原告，律师，参与者和支持者的签名

China threatens Spain over Tibet lawsuits; Judge announces extension of cases to cover Nangpa shooting

In a new written state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jected a judicial request for Chinese officials to testify in court in Madrid and demanded tha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block a ground-breaking investigation in the Spanish High Court on crimes against the Tibetan people, calling it a "false lawsuit." The letter is the first written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ince two Tibet lawsuits were accepted in the Spanish High Cour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 doctrine that allows courts to reach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in cases of torture, terrorism,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Spanish Judge Santiago Pedraz informe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Justice on May 5 of rulings against eight Chinese leaders, including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Secretary Zhang Qingli, in the Spanish High Cour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harsh crackdown on dissent in Tibet that has been ongoing from March 2008. The judge had requested authorization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to question the defendant in China should they refuse to do so before the Spanish court.

The Tibet lawsuits are threatened by a resolution passed by Spain's Congress on May 19 to limit the jurisdiction of judges to cases in which there is a clear Spanish connection.

Despite the ruling and continuing pressure from China, Judge Pedraz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extension of one of the Tibet lawsuits to includ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angpa shooting of September 2006, when 17-year old nun Kelsang Namtso was shot dead by Chinese border forces while attempting to cross Tibet's border into exile. This is an explicit admission of the incident a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On July 14, in a written acceptance of the extension, Judge Pedraz again asked the Indian government for permission to travel to India in order to interview the Tibetan witnesses of the Nangpa shooting. American climber, Luiz Benitez, who witnessed Kelsang Namtso being fatally shot in the back as she and other nuns, monks and children attempted to flee across the Nangpa Pass, gave evidence on July 17 to Judge Pedraz at Spain's High Court.

2009年8月20日

西藏国际运动

中国恐吓西班牙有关西藏诉讼；法官宣布扩大案件的范围包括“南巴拉枪杀案”

在一个新的书面声明中，中国政府拒绝其官员到马德里的法庭去作证的司法要求，并要求西班牙政府阻止该国法庭对西藏人民所犯下罪过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开创性地审查。他们说那是一个“假官司。” 西班牙高级法院在“普遍司法权”的原则下接受了关于西藏的两个诉讼案后，那封信件是中国政府的第一个书面回复。“普遍司法权”的原则允许法庭超越国界审查有关酷刑、恐怖、种族灭绝，以及危害人类等罪行。

5月5日西班牙法官圣地亚哥佩德拉子通知中国司法部西班牙高级法院判决八名中国领导人，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前党委书记张庆黎。自从2008年3月，在西藏不断地严厉镇压持不同政见的藏人。他要求中国司法部，如果被告拒绝在西班牙法庭出面，批准在中国国内可审讯。

5月19日西班牙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限制司法权只包括跟西班牙有明确联系的案子。因此，这与西藏诉讼有关的案子受到了危机。

法官圣地亚哥佩德拉子不顾西班牙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及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最近公布了关于西藏的这一个诉讼范围不仅得到扩展，而且包括了2006年9月的“南巴拉枪杀案”。在那次事件中十七岁的藏族尼姑格桑南措试图越过西藏边境，准备流亡时不幸遭

到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杀。很显然，这一事件是一个危害人类的罪行。7月14日，在一份关于西藏案子扩大的书面承诺中，法官圣地亚哥佩德拉子要求印度政府允许他前往印度去采访“南巴拉枪杀案”的藏族证人。当藏族尼姑格桑南措跟其他尼姑、和尚、小孩等跨越山口逃离时，美国登山运动员刘易斯·贝尼特斯亲眼目睹了中国边防部队枪杀格桑南措尼姑，并于7月17日在西班牙法庭已作证了。

(向西班牙法庭提起诉讼后的结果内容译文)



上图为 2007 年，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金质奖章时，好莱坞著名演员理查德基尔的要求下，达那·晋美桑布为华盛顿藏人在举办庆祝活动时所创作的歌词稿。

西藏政策研究学会

頓尔宗·德丹译

2015 年 2 月 16 日